

香港傳真

(香港) 桑尼研究有限公司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11-27

2011年5月13日

低烈度內戰及其貧困和社會矛盾根源 —— 政府軍兵敗揭破印度軟肋

商務部研究院 梅新育

引言

在近幾年來的西方政客、媒體乃至投資銀行中，中印比較、龍象之爭似乎已成“顯學”，舉凡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個領域，無不被他們拿出來評頭品足一番，印度對中國的“瑜亮情結”又推動這種比較越發熱門。據稱，由於擁有“優越”的民主政體，由於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內需驅動而不是外需拉動，由於印度服務業比重較大的經濟結構優於中國製造業比重大的經濟結構，印度可持續發展能力遠超中國；較為年輕的人口結構更將令印度如虎添翼，加快超越日益面臨“人口紅利”枯竭壓力的中國；……諸如此類的邏輯在西方輿論和我國國內自由主義者中贏

得了相當廣泛的認同和宣揚，“印度龜終將超越中國兔”在這些群體中幾成衆口一詞，有的西方大國官方報告甚至現在就將印度列為世界第三超級大國（參見後文）。印度近幾年經濟增長業績不錯，實際 GDP 增長率雖然還不如中國，但高於世界平均水平，也高於同為熱門新興市場的越南等國（參見表~1），似乎正在驗證上述判斷。主要國際經濟組織對印度增長的預期不斷提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2010 年 4 月號《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對 2010 年印度經濟增長的預期為 8.8%，10 月號《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就將預期提高到了 9.7%。還有些西方投行和其它機構宣稱印度經濟增長率將迅速超越中國，其經濟規模數十年內將趕超中國躍居世界第一，如美國花旗集團 2011 年 2 月的一份報告就宣稱 2050 年印度 GDP 將躍居世界第一。印度高級官員們的言論也越來越自信，2010 年 3 月，印度財政部發表報告，聲稱印度經濟增速可望在四年內超越中國躍居世界榜首，財政部長慕克吉 (Pranab Mukherjee) 也預計印度經濟不久便可實現兩位數增長率。基於這些渲染，不少西方政客和媒體鼓動國際投資者背棄中國投奔印度，某些西方國家對中印投資確實也出現了此消彼長的態勢。按日本財務省統計，2006~2008 年，日本對印投資分別增長 15.9%、27.1% 和 4.3 倍，對華投資則分別下降 29.6%、22% 和 3.7%（2008 年中國統計日本對華投資微增 1.7%），對印投資於 2008 年超過對華投資。日本國際協力銀行以 605 家日資製造企業為對象實施的“2010 年度海外直接投資”調查結果也顯示，儘管中國仍然被列為今後三年前景最看好投資地，但印度超過中國被視為今後十年前景最看好投資地。

然而，2010 年 4 月 6 日切蒂斯格爾邦 (Chhattisgarh) 丹特瓦達 (Dantewada) 一陣槍響，戳破了印度“繁榮”的畫皮，印度中央後備警察部隊 (Central Reserve Police Force) 和切蒂斯格爾邦警察部

隊圍剿印度共產黨（毛澤東主義）反政府武裝不成，¹ 反遭伏擊，80多名官兵喪生。此後幾個月，印度軍警又屢遭印共（毛）武裝打擊。經此一役，可以判定，印度現行政治秩序將長期面臨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等尖銳複雜的國內矛盾威脅，近年的“經濟增長”和政策還在某些方面進一步激化了社會矛盾，反政府武裝已在政治理論和社會治理實踐方面對現行政治秩序構成了嚴峻挑戰，而印度政府非但缺乏有效鎮壓反政府武裝的能力，其霸權主義色彩濃郁、超越國力的外交政策反而可能引火燒身，加劇和製造矛盾。我們和國際商界藉此可以對印度發展潛力、商業環境等作出更清醒準確的評判，我們國內經濟社會發展也可以從中汲取不少教訓。

表~1：1990年代以來印度與其它國家和地區實際 GDP 增長率對比

國家 / 地區	世界	發達國家	發展中 國家和地區	亞洲發展 中國家	中國	印度	越南
1992~2001 平均	3.2	2.8	3.8	7.3	10.3	5.7	7.7
2002	2.9	1.7	4.8	6.9	9.1	4.6	7.1
2003	3.6	1.9	6.2	8.2	10.0	6.9	7.3
2004	4.9	3.2	7.5	8.6	10.1	7.9	7.8
2005	4.5	2.7	7.1	9.0	10.4	9.2	8.4
2006	5.1	3.0	7.9	9.8	11.6	9.8	8.2
2007	5.2	2.8	8.3	10.6	13.0	9.4	8.5
2008	3.0	0.5	6.1	7.9	9.6	6.4	6.2
2009	-0.6	-3.2	2.4	6.6	9.1	5.7	5.3
2010	4.2	2.3	6.3	8.7	10.5	9.7	6.0
2011	4.3	2.4	6.5	8.7	9.6	8.4	6.5
2015	4.6	2.3	6.7	8.5	9.5	8.1	7.5

註釋：（1）2010、2011、2015年數據為預計數。

（2）2010年第二季度印度 GDP 增長 8.8%，但消費價格指數高達 9.97%（7月）。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10年4月）》，第 155、160 頁；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10年10月）》，第 177~183 頁。

¹ 印度中央後備警察部隊任務使命類似中國的武警，因此中文作者往往簡稱其為“印度武警”，本文也沿用這一簡稱，印度共產黨（毛澤東主義）簡稱“印共（毛）”，外界也常稱之為“毛派”或“納薩爾派”。

一、兩極分化、種姓和階級壓迫 是印度反政府武裝運動誕生成長的沃土

（一）印度的大面積貧困和兩極分化

這幾次戰鬥揭示的首要問題是印度國內社會階級矛盾之尖銳，遠甚於它最希望趕超的國家——中國，更不用說民族和宗教矛盾了。中國傳媒界、法學界、經濟學界某些自由主義人士向國人描繪了一幅印度貧困階層享受完全人權保護的美麗圖景，聲稱他們的貧民窟是“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因此，印度貧民窟居民享受的人權高於中國城鎮小康之家；²但現實是無論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前還是改革開放後，印度貧困人口比例都明顯高於中國。根據世界銀行資料，1970、1973、1988年印度貧困人口比例依次為52.4%、42.5%和39.6%，雖然有所下降，但貧困人口數依次為2.873億、3.117億和3.223億，絕對數字反而有所上昇。³直到西方大肆讚揚的印度全面經濟改革啟動九年後的2000年，印度貧困人口比重仍高達28.6%，是中國1998年同一指標（4.6%）的6.2倍，也明顯高於泰國、印尼、菲律賓等東南亞主要國家及其鄰國斯里蘭卡，其中鄉村貧困人口比重為30.2%，城市貧困人口比重24.7%。⁴

印度的問題不僅在於大面積貧困，更在於兩極分化。本世紀初以來，印度各邦中人均收入平均差距為六倍，最大者高達60倍，⁵一

² 筆者在2009年第一屆中印論壇的會議材料中就見到了這樣的文章，且公開宣揚這類論點的人中不乏頗有幾分知名度者。

³ 世界銀行：《印度：貧困、就業和社會福利》，1989年（轉引自張文木：《印度國家發展潛力及其潛力評估——與中國比較》第41頁）。

⁴ 國家統計局：《國際統計年鑑2009》第232~233頁。

⁵ 王立勇：〈當“鼠標”的效率遭遇“泥塊”的公平——耐人尋味的印度大選〉，《政黨與世界》2004年第8期。

小撮鉅富和普遍貧困者之間的生活對比尤為強烈。印度首富穆克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2007年便名列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14名，是印度第一個財富超過一萬億盧比的超級富豪，以前居住孟買14層私宅“海風”大廈猶嫌不足，又斥鉅資為自己建造173米高私宅“安蒂拉”大廈，⁶每層層高相當於普通住宅三倍，總樓層面積超過法國凡爾賽宮，其設施包括直昇機停機坪、多處空中花園、佔兩層樓面積的健身俱樂部、獨立的家庭電影院、可通過透明牆壁俯瞰城市景觀的貴賓客房和六層樓面積的停車場，為居住者穆克什夫婦、穆克什母親、三個兒女共計六名主人服務的全職雇員和僕人多達六百名。與此相對應，根據印度住房和城市扶貧部專門負責調查全國城市貧民窟人口的專家委員會調查，2001年印度全國城市貧民窟人口為7526萬人，到2011年底預計將達9306萬人，十年增加1780萬人，其中，首都新德里貧民窟人口將達316萬人，比2001年增加85萬人；全國金融中心孟買所在的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貧民窟人口將達1815萬人，居全國各邦之首，⁷其中，孟買擁有亞洲最大的貧民窟達拉維(Dharavi)。馬克思早已提出的資產階級財富和無產階級貧困在兩個極端的積累，在穆克什·安巴尼豪宅與其背後的孟買貧民窟上對照得格外鮮明。

絕對貧困和收入分配失衡已經嚴重損害了印度大眾的基本生存條件。令人震驚的是，在號稱“印度大放光芒”的21世紀初，印度人均糧食消費量不增反減，由1997~1998年度的174公斤減少到2003~2004年度的151公斤，為二戰以來最低水平。⁸2006年，印度全部人口營養不良發生率為20%，比世界平均水平(14%)高近一半。而且，越南、尼日利亞等國雖然貧困人口比重高於印度，但全

⁶ Antilla，一個神話中小島的名字。

⁷ 新華社轉《印度時報》報道，2010年9月4日。

⁸ 王立勇：〈當“鼠標”的效率遭遇“泥塊”的公平〉，《政黨與世界》2004年第8期。

部人口營養不良發生率低於印度，⁹ 充分暴露了印度在收入分配、社會公正和維護國民基本生活方面的嚴重缺陷。¹⁰

（二）印度貧困和兩極分化難以明顯改觀

由於以下原因，在可預見的未來，印度上述貧困、收入分配不平等和人口營養不良狀況難以發生重大改善：其一是印度農村人口佔總人口 72%，但近年來農業發展緩慢，“十五”期間（2002~2007 年）農業年均增長率僅有 2.5%，2009/2010 財年增長率更只有 0.2%。

其二是土改不深入徹底，土地佔有關係仍然嚴重不平等，不僅妨礙農村和農業生產發展，更直接嚴重損害改善收入分配、社會公正和維護國民基本生活。須知每一個大地主必然對應著一批無地農民，而“無地則反”是農業社會的規律。

印度官方不是沒有認識到土地革命的重要性，早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的 1936 年 4 月，印度國大黨就在勒克瑙召開的第 40 屆年會上提出了一項土地綱領，明確提出“國家最重要和最緊迫的問題是農民驚人的貧窮、失業和債務，這些基本上是由於過時的和壓迫的地權制度和田賦制度，……”1945 年 9 月、11 月，國大黨國家計劃委員會先後開會討論土地問題，還提出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組織合作社”和“取消國家和實際耕種者之間各類中間人地主”的土改方針。¹¹ 獨立之初，國大黨領導的印度中央政府就開始推行土改，但由於國大黨本身就代表大地主大資本家利益，如同在大陸時期的中國國民黨政權一樣無法真正對自己的統治基礎——地主資產階級集團下手，加之

⁹ 國家統計局：《國際統計年鑑 2009》第 232~233 頁。

¹⁰ 下文第五節及表~3 將進一步論述印度收入分配失衡問題。

¹¹ 黃思駿：《印度土地制度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8 年，第 281、284 頁（轉引自張文本：《印度國家發展潛力及其潛力評估》第 151~152 頁）。

印度政體掣肘，使得印度土改歷時 30 餘年，最終還是淪為“印度國家發展奠基中最大的政治豆腐渣工程”（引用張文木語）。

和印度其它重大政治和經濟決策一樣，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成為印度土改的特徵。國大黨政府在 1959 年 1 月便通過了實行土地限額制度的決議；1971 年 8 月，印度中央土改委員會又規定以五口之家為一個分配單位，最高限額為最好土地十英畝至最劣土地 54 英畝之間；……然而，直到 2004 年，中國學者溫鐵軍在印度農業大邦比哈爾邦（Bihar）考察時，發現該邦直到 1980 年代仍有佔地上萬英畝的大地主，直到 2004 年他考察時仍有佔地超過二千英畝的地主，即高達當時法定佔地上限（25 英畝）80 倍以上，以至於無地農民至少佔該邦八千萬人口的 20% 之多，地主佔有的土地也是 20%。相應地，地處恆河平原、雨熱同季、物產豐饒、土地和礦產資源在印度各邦中均名列前茅的比哈爾邦，貧困和文盲人口在印度也“獨佔鰲頭”，¹² 又是印共（毛）等反政府武裝活躍的地方。

印度政府諱疾忌醫及其法律制度的缺陷加劇了上述土地佔有關係問題。儘管佔地遠遠超過法定上限的大地主不乏其人，但無論是政府、執政黨還是主要在野黨均普遍矢口否認現實，溫鐵軍在考察時對這一點頗有感觸。而既然不承認客觀存在的問題，那就更談不上切實解決問題了。與此同時，印度從英國殖民者繼承下來的西式司法體系成本極高，訴訟程序冗長，¹³ 致使僅比哈爾邦就有數以萬計的土地

¹² 溫鐵軍：〈印度北方農民運動和“毛派”武裝鬥爭考察報告〉，載於張文木：《印度國家發展潛力及其潛力評估》。

¹³ 在印度司法體制所宗的英國，司法制度繁冗、高成本的弱點就暴露得非常充分。據英國《每日郵報》報道，英國警察監察部門 2010 年的一份報告披露，英國警檢方處理一起簡單的室內盜竊案件就要動用 30 多名人力，經過一千多道程序；結果，儘管處理的案件越來越少，但英國司法審判系統的總成本在五年內增長了四分之一，達到 220 億英鎊（《環球時報》2010 年 11 月 4 日，第 5 版）。

訴訟案，¹⁴ 大面積土地陷於動輒長達數十年的訴訟程序而禁止耕種，依法拋荒，數以萬計的無地農民則忍饑挨餓，或鋌而走險揭竿而起，如此局面，堪稱荒唐。

（三）印度種姓和階級壓迫觸目驚心且堅如磐石

物質貧困已經相當嚴重，種姓和階級壓迫更令人觸目驚心。數千年來，一直處於社會最底層的印度“賤民”（意為“不可接觸者”）不能與高種姓人同飲一井水、同拜一座廟，更不能通婚。他們沒有土地和房產，甚至沒有飲用水，世代以從事苦役為生。不錯，印度獨立後的憲法規定廢除種姓制度，賤民階層在法律上已經不復存在，1989年12月~1990年11月領導聯合政府的總理維什瓦納特·普拉塔普·辛格（V.P. Singh）還規定在政府部門中為低種姓民衆保留了較大份額，現任國會下院女議長庫瑪爾（Meira Kumar）就是出身賤民家庭，賤民出身的納拉亞南更於1997年競選獲勝，出任印度第九任總統（2002年卸任）。但這僅僅是特例，因為納拉亞南出身城鎮家庭，父親是醫生，為他創造了接受高等教育、最終走上仕途的條件。而印度絕大多數賤民都在鄉村，他們一貧如洗，其社會地位和境遇一直沒有得到多少改變。從八世紀以來伊斯蘭教入侵印度次大陸時期大批賤民脫離印度教改宗伊斯蘭教，到近幾十年多次發生賤民集體脫離印度教改宗佛教事件，印度賤民試圖通過改換宗教門庭而擺脫種姓制度桎梏，但印度社會對約佔全國人口四分之一的賤民和其他低種姓的歧視依然故我。溫鐵軍2004年在印度比哈爾邦考察時，發現直到1970年代，該邦高種姓地主竟然仍對農民行使野蠻的

¹⁴ 溫鐵軍：〈印度北方農民運動和“毛派”武裝鬥爭考察報告〉，載於張文木：《印度國家發展潛力及其潛力評估》。

“初夜權”。¹⁵ 2009年12月，在比哈爾邦距首府巴特納（Patna）僅80公里的沙蘭（Saran）地區沙蘭普（Salempur）村，20多歲的賤民青年曼吉（H. K. Manjhi）僅僅因為參加別人婚禮並坐到椅子上觀看歌舞表演，¹⁶ 就被高種姓群眾開槍擊斃，警方直到數百名賤民群眾為此示威後才得知發生命案，但數日過後卻未逮捕任何涉案嫌疑人。¹⁷

而且，以少兵治大國的英國殖民者保留了印度的傳統社會結構和傳統特權階層為自己服務，贏得獨立的“非暴力不合作”方式又決定了新生的獨立印度不可能全面開展深刻的社會改造，導致現代印度在相當程度上形成了城鄉割裂的二元司法結構，而這種二元司法結構強化了傳統種姓和階級壓迫制度的力量。

在佔印度總人口72%的廣大農村基層，至遲從孔雀王朝時期就形成了由評議會¹⁸負責農村基層行政管理的傳統並沿襲上千年，印度獨立後繼承了這一傳統，其《憲法指導原則》規定各邦有義務組織農村評議會，使之擔負起村級行政機構職能。1992年，印度通過第73項憲法修正案，又將縣、鄉、村三級評議會制度確定為必須在印度全國實施的法定制度。從表面上看，評議會制度頗為“民主”，每五年選舉一次，其中為婦女及表列種姓、表列部落等弱勢階層保留了席位，某些中國學者對其不乏溢美；¹⁹ 政府也賦予他們相當的實權，如1961年底印度政府宣佈實行土地持有最高限額制度，規定超出限額的土地須由國家交給村評議會，並由村評議會分給無地、少地農民

¹⁵ 溫鐵軍：〈印度北方農民運動和“毛派”武裝鬥爭考察報告〉，載於張文木：《印度國家發展潛力及其潛力評估》。

¹⁶ 據當地人表示，受害者曼吉的姓氏“Manjhi”屬於一支因貧窮而以抓鼠為食的穆沙哈（Musahar）族人。

¹⁷（臺灣）中央社2009年12月4日報道。

¹⁸ panchayat，亦譯作“村務委員會”或音譯為“潘查雅特”。

¹⁹ 葛寧：〈印度農村基層政權運轉制度〉，《讀書》2010年第9期。

或農業合作社耕種，以限制大地主佔有過多土地。但在實踐中，評議會通常由高種姓和權貴把持，致使其決策、施政目的往往是維護高種姓和權貴者的特權。正是在全印各地村評議會的操縱下，印度政府近40年前就交給他們實施的土地限額制度普遍落空。

而且，評議會已經形成了一套事實上的司法體系，其權力之大，達到了可以公然下令殺人、強姦的地步。如果一位低種姓男孩想娶一個高種姓女孩，其結果很可能就是由評議會逼迫男女雙方父母處死自己的孩子；倘若哪位婦女拒絕下地幹活或做家務，評議會甚至會下令全村圍觀她被輪姦。²⁰ 種姓制度傳統上禁止低種姓男子與高種姓女子婚娶，但在現實生活中，有時高種姓男子向低種姓女子求愛也會遭遇不測。2008年11月，由於給同村一名較低種姓女孩寫了一封情書，比哈爾邦15歲男孩馬尼斯·庫馬爾就遭到毒打和剃光頭遊街，最後被扔到火車下碾死，而這類事情並非孤例。

種姓壓迫色彩濃重的傳統司法體系如此，貌似冠冕堂皇的政府司法體系也很難給受剝削壓迫者多少希望。收入和財富分配嚴重失衡、從英國殖民者繼承下來的高成本西式司法體系兩者結合，導致印度窮人犯輕罪而遭重罰，權貴富豪犯重罪卻能逍遙法外，即使蹲大牢也可以在牢中照樣花天酒地，這類事情比比皆是，某些案例已經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1984年印度博帕爾毒氣洩漏事件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工業毒氣洩露案件，美國聯合碳化物公司劇毒化工原料洩露直接致死2.5萬人，間接致死55萬人，20多萬人永久殘廢，死傷合計超過二戰末美國對日本的兩次原子彈爆炸，但聯合碳化物公司的美國老闆安德森事發後逍遙法外，印度法院直到2010年方才裁定餘下七名印度籍高管有罪，且最多僅將被判處兩年監禁。

²⁰ Sultan Shahin：〈為何印度政府撲滅不了印度的毛澤東主義者革命武裝？〉亞洲時報在線 2005年1月25日(http://www.atimes.com/atimes/South_Asia/GA22Df05.html)。

(四) 階級矛盾造就強大反政府武裝

正是由於無以為生、基本人權遭受踐踏，衆多印度貧苦階層走上了絕路，據印度官方統計，僅 2008 年一年自殺的印度農民就多達 16196 名，把印度 1997 年以來農民自殺人數推昇到 19.9132 萬人，相信實際自殺人數更高於官方統計，馬哈拉施特拉邦、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喀拉拉邦（Kerala）、中央邦（Madhya Pradesh）和切蒂斯格爾邦農民自殺情況尤為嚴重，號稱印度農民“自殺五大邦”（BIG 5）；更有大批貧苦階層被逼上梁山，造就了人民戰爭集團、毛澤東主義共產黨人中心等衆多反政府武裝，²¹ 有的存在了半個世紀，有的成立於十多年前，屢仆屢興，無法根絕，號稱全世界反政府武裝組織最多的國家。到 2009 年，印度僅依據《防止非法活動法》而禁止的武裝組織就有 34 個，其中伊斯蘭激進組織 12 個，東北部反政府組織 12 個，左派武裝組織四個，旁遮普和泰米爾武裝組織各三個。此外，印度還存在一批沒有列為非法組織的武裝，僅東北部分離組織和地下武裝就有 120 多支，長期活動的有 50 余支。²²

印度反政府武裝組織不僅數量多，其影響力也不可低估。按照印度內政部數據，1996~2009 年間，在與印度反政府武裝的戰鬥中死亡人數超過 6486 人，2004 年以來居高不下，每年都在五百人以上，2008、2009 年兩年更分別達到了 794 人和 1134 人（參見表~2）。反政府武裝中最活躍的印共（毛）武裝在 2010 年前十個月的戰鬥中

²¹ 人民戰爭集團（the People's War Group）正式全名為印度共產黨（馬列）[人民戰爭]，縮寫為“PWG”或“CPI(ML)[PW]”，毛澤東主義共產黨人中心（Maoist Communist Center）縮寫為“MCC”或“MCCI”，兩組織均起源於 1966 年成立的“印度共產黨毛澤東主義中心”及由此於 1969 年成立的印度共產黨（馬克思~列寧主義），於 2004 年 9 月 21 日合併成立印共（毛）。

²² 呂昭義、餘芳瓊：〈印度東北地區的民族分離運動與反政府武裝〉，《南亞研究》2010 年第 2 期。

至少擊斃了 260 名警察，²³ 目前活動範圍已經橫跨印度 28 個邦中的 17 個邦、604 個行政區中的 223 個區，覆蓋印度 40% 國土，其控制的“紅色走廊”地區面積廣達 9.2 萬平方公里，人口 1.8 億，約佔印度人口六分之一。如此規模，倘在中國，好比反政府武裝根據地從陝西、甘肅、四川蔓延至河南、湖北、安徽，直到山東和蘇北沿海。相比之下，2003 年末印度各毛派組織影響的地區只有九個邦 55 個縣，不到七年，影響的邦數目就幾乎翻了一番。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文化和宗教傳統能夠影響反抗壓迫的烈度，但無法徹底消除反抗存在；仍然存在大地主、“初夜權”至少延續到 1970 年代的比哈爾邦成為印共（毛）武裝最活躍的邦之一，實不足為奇。而印共（毛）活躍的這些邦資源相當豐富，切蒂斯格爾邦鐵礦、煤炭、鋁土等礦產資源為印度之最，印共（毛）最活躍的五個邦煤炭儲量佔印度煤炭總儲量的 85%，從而增強了印共（毛）活動的影響力。

表~2：官方統計的 1996~2009 年間印度反政府武裝戰鬥中死亡人數

年份	死亡人數	年份	死亡人數	年份	死亡人數
1996	156	2001	100+	2006	750
1997	428	2002	140	2007	650
1998	270	2003	451	2008	794
1999	363	2004	500+	2009	1134
2000	50	2005	700+	合計	6486+

資料來源：印度內政部 (the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轉引自英國廣播公司 (BBC：“more than 6,000 people have died during the rebels' 20-year fight”，<http://www.ploughshares.ca/libraries/ACRText/ACR-IndiaAP.html>；http://news.bbc.co.uk/2/hi/south_asia/8507525.stm)。

在其控制區，印共（毛）武裝建立了稅收、司法、學校等行政機構乃至報刊出版發行機構，儼然已成國中之國。印共（毛）政治局 2009 年 9 月發佈的一封黨內通信自豪地列舉了過去一年他們取得的成就：

²³ 這是印度內務次長梅肯 (Ajay Maken) 2010 年 11 月 9 日在議會下院提供的數字。

在丹達卡冉亞，²⁴ 我們的革命人民委員會(janathana sarkars)——已出現的人民政權及其組織得到了鞏固和擴展。人民政權機關已經擴展至新的數百個村莊並且在該地區和不同部門得到綜合加強。革命人民委員會增加了商業和工業的多個部門，反映出人民政權機關的職能不斷擴大。一份名為 *Lokur Adhikar* 的崗德語 (Gondi) 雜誌也在 2009 年 5 月代表我們人民政府開始宣傳工作。……

在長期的武裝鬥爭中，印共(毛)等反政府武裝樹立了可觀的權威，對不少公共事務施加了重大影響。一方面，他們對選舉等活動的抵制影響範圍相當廣大，他們提出的強制性要求有著廣泛的威懾力。2007 年 6 月，印共(毛)宣佈對中部和東部六邦實行“經濟封鎖”，結果這些邦立即爆發了一系列暴力活動，有些邦經濟活動陷入癱瘓。特別是選擇武裝鬥爭路線的印共(毛)及其前身一貫認為印度所謂“民主選舉”只是一個昂貴的騙局而已，因此抵制選舉成為他們顯示現政權缺乏合法性、虛弱的常用鬥爭手段。根據印共(毛)政治局 2009 年 9 月發佈的一封黨內通信，該黨在 2009 年 5 月落幕的人民院第 15 屆大選期間組織了大規模抵制活動，對國家政治產生了重大影響。印度中央和地方政府雖然派出警察部隊重兵駐守毛派活躍地區三個多星期，印共(毛)及其武裝力量、外圍組織仍發動了一次規模較大的政治宣傳攻勢，除了對持槍挾持人民去投票的政府軍實施戰術性反擊外，他們的宣傳也相當有效，以至於丹達卡冉亞幾乎沒有任何政黨參加競選，在比哈爾、恰爾肯德 (Jharkhand)、奧里薩邦 (Orissa) 等不少其它地區也發生了全面抵制。2010 年 5 月 18 日，印共(毛)武裝勒令奧里薩、比哈爾、西孟加拉 (West Bengal)、恰爾肯德、切蒂斯格爾五個邦所有企業、機構和運輸部門罷工兩天，印度內政部部署了大量安全人員警戒，但切蒂斯格爾邦和奧里薩邦仍大面積停工。

另一方面，他們也會有選擇地支持一些公開活動的政黨和政界人

²⁴ Dandakaranya, 印度中部橫跨五個邦的叢林地區。

士。在印共（毛）武裝活躍的邦，多年來主流政黨要想競選獲勝就必須贏得毛派支持，至少是不抵制，用亞洲時報在線 2005 年 1 月 25 日報道的話來說，在比哈爾、恰爾肯德、切蒂斯格爾、奧里薩、安得拉等邦的郊區和一些小鎮，沒有毛澤東主義者首肯就什麼也幹不成。²⁵

正由於接二連三贏得軍事和政治勝利，印共（毛）信心和勇氣大增。此前，在他們為了擴大影響而向外界發佈的電視錄像中，成員都是蒙面以免被認出，這幾年來發佈的訓練、作戰等宣傳片中戰士們已經基本上不蒙面了。

而且，印度毛派已經建立了相當的國際聯繫，一方面增強了他們的實力，放大了他們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加大了印度政府鎮壓、剿滅他們的難度。2001 年 7 月 1 日，來自印度、尼泊爾、孟加拉和斯里蘭卡的毛派革命者組成名為“南亞毛澤東主義者革命武裝組織協調委員會”的組織，以協調他們在南亞地區的活動，便利他們之間的跨國技術交流、武裝訓練和武器流通。據稱印度毛派武裝從尼泊爾獲得槍支，同時向尼泊爾毛派武裝提供從印度採石場和軍工廠取得的炸藥。近年，印共（毛）前身之一人民戰爭集團還走出亞洲，與歐洲、非洲、拉美和中亞的馬列 / 毛澤東主義者革命武裝組織建立了關係，其定期接觸對象包括秘魯、巴西、墨西哥、乍得、塞內加爾、尼泊爾和菲律賓的類似組織。

二、印度近年的“經濟增長”和政策 在某些方面進一步激化了社會矛盾

本來，推動經濟增長與改善收入分配並舉，把國民收入的“蛋糕”做大，是解決上述貧困等社會問題的根本出路；但由於社會制度

²⁵ Sultan Shahin：〈為何印度政府撲滅不了印度的毛澤東主義者革命武裝？〉亞洲時報在線 2005 年 1 月 25 日。

等方面的一系列問題，從引進國外“新技術”到招商引資、設立經濟特區，印度近年實施的許多旨在加快經濟發展的措施固然在一時一地取得了某些正面效果，卻同時進一步激化了社會矛盾。1995年以來，印度政府批准美國轉基因棉花進入印度市場，十餘年來，開發生產轉基因棉花種子的美資孟山都公司和他們資助的少數“科學精英”雖然大發其財，轉基因棉花的固有缺陷、孟山都公司誘人入彀和索取壟斷高價的商業手法、印度盛行的高利貸相結合，卻把千千萬萬印度棉農推向債務深淵和破產，數以萬計的棉農被迫自殺。²⁶

引發社會震蕩更大的是引進外資和建立經濟特區。對於印度這樣面臨資本和外匯缺口的國家，在平等互利基礎上引進外資是必要的，但印度引進外資工作本身存在結構性的缺陷，招商引資工作中的錯誤做法更引爆了一系列暴力衝突。

印度引進外資的結構性缺陷在於引進外資總額中流動性、投機性強的組合投資多於直接投資，從而有損印度宏觀經濟穩定性；在直接投資中來自離岸金融中心的投資太多。印度從1991年起積極引進外資，1991年8月~2009年3月，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累計45364.7億盧比（約合1065.24億美元）；2008/2009財年，吸引外資12291.9億盧比（約合273.09億美元），同比增加25%。按照賬面統計，印度洋上的離岸金融中心毛里求斯是印度第一大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國，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地新加坡也是離岸金融中心，儘管新加坡在工業和商貿服務業等實體經濟部門具備較強實力，與英屬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毛里求斯等純粹的避稅港型離岸金融中心不同，而且被金融穩定論壇列為與國際監管比較合作的離岸金融中心。2000年4月~2009年3月，對印累計投資最多的國家依次為毛里求斯（44%），

²⁶ 趙國賀：〈轉基因種子為害印度，印度已有20萬棉農自殺〉，《世界博覽》2010年第14期。

新加坡（9%），美國（8%），英國（6%），荷蘭（4%）。²⁷ 離岸金融中心包攬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地前兩名，且所佔比重高達 53%，表明印度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很大一部分屬於內資外流然後回流的返程投資，這部分返程投資和很大一部分“真正的”外資都非常看重稅收優惠和避稅目標，投機性較強而生產性不足。

正是印度賬面“外商直接投資”的上述特點和相關制度的缺陷，使得印度的招商引資和建立經濟特區等措施在擴大印度製造業產出和出口方面效果不彰，不少特區淪為便利企業和富有個人偷稅漏稅的“國內離岸金融中心”，卻製造了大批失地農民，進一步激化了社會矛盾，為反政府武裝造就了大批潛在新成員和同情者。

印度之所以要提出發展製造業、發展經濟特區，本意是如同中國那樣，通過發展印度目前相對滯後的製造業創造盡可能多的就業機會。然而，印度《經濟特區法案》對特區徵用土地的具體用途規定過度“溫柔”，僅僅規定被徵用土地四分之一需用於加工業，其餘部分可以用於任何目的，其執行更加軟弱無力而常常淪為具文。結果，截至 2007 年初，印度已設立經濟特區一半以上是面向印度已有一定發展的 IT 業、基於 IT 的服務業和製藥業，而非他們當初所期望的製造業。更有甚者，在印度房地產泡沫火爆火發的背景下，一些經濟特區實際上成為享受政府稅收優惠的房地產特區，已批准經濟特區多達 65% 的土地被用於建設住宅或寫字樓、大型購物中心和醫院等。最富有“空手道”色彩的是，某些企業還拿低價圈佔的土地向銀行高價抵押獲取貸款。印度前總理維·普·辛格曾猛烈抨擊過北方邦達德里電力工程項目，該項目徵地數量遠遠大於實際需求量，而且向農民徵地的補償價格是每英畝 150 盧比，信實集團獲得土地後未作任何開發就定價為 5700 盧比計入資產，並以此為抵押從銀行獲得鉅額貸款，

²⁷〈印度國家概況〉，外交部網站 2010 年 8 月（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yz/1206_42/）。

工程則延期開工。²⁸ 在這種情況下，失地農民沒有多少機會以非農業部門就業形式獲得非現金補償。相比之下，中國開發和徵地項目中雖然也存在種種壓榨、掠奪和欺詐現象，但由於製造業項目居多，就總體而言能夠為失地農民提供較多的非農業部門就業補償。

因為經濟特區數量太多導致失地農民太多，潛在補償負擔甚重；由於經濟特區在很大程度上淪為避稅、圈錢和房地產遊戲，所以不可能通過就業的方式補償失地農民；志在避稅、圈錢和攫取房地產暴利的商人們多半沒有足夠實力、更不可能有意願提供足夠的現金補償；……所有這一切結合起來，導致印度開發區熱成為掠奪農民耕地熱。儘管在印度享有崇高威望的國大黨主席索尼婭·甘地（Sonia Gandhi）發出了嚴厲警告，主張應保護農民免受貪婪開發商侵害；儘管印度前總理維·普·辛格提及這個問題時甚至激烈地表示想成為一名“毛主義者”；儘管2006年末、2007年初印度政府一度暫停批准304份建立經濟特區的計劃，直至農民徵地補償等問題得到解決；但農民遭受的大面積損害已成事實，而且一貫以步履蹣跚聞名且深受官商利益集團掣肘的印度政體對此也沒有表現出太強的糾錯能力。

上文已經提及，印共（毛）活躍的幾個邦礦產資源豐富，2002年啟動、至今仍在持續的這一輪全球性初級產品牛市行情提高了這些資源的價值（中國鋼鐵行業就對印度鐵礦石價格和市場地位的上昇感受深切），也刺激了對這些地區的投資開發，相應帶來了佔據農民和部落土地、環保、破壞宗教聖地等問題。印度聯邦政府試圖對地方人民抗議作出回應，加強保護環境和部落財產權，或者對受損群體給予更公平補償，如旨在確認部落或個人祖傳耕作土地權的2006年《森林權利法》。然而，這類舉措往往成為地方官僚腐敗或辦事不力的犧牲品，合法的申訴往往被駁回或不了了之。印度社會有建議修改《開採及礦產法案》，將26%的礦產利潤交給地方（中國與此相似的舉

²⁸（印）維·普·辛格：〈我要成為一名毛澤東主義者——VP·辛格感人至深的懺悔〉。

措是業已通過實施的提高資源稅稅率)，卻招致了礦產業加緊開展政治游說狙擊，這項擬議中的法案能否通過、即使通過後能否執行，均在未定之天。

正因為如此，《印共（毛）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2007年2月1日）激烈抨擊道：“三百個計劃內的經濟特區事實上就是建立了三百塊外國領土，這些外國領土劫掠我們大量的良田，這些外國領土裡充斥了無數國內外的政治騙子。與此相配套的是市中心成了精英階級的私宅，它鋪就了財閥們的零售渠道，這一切都是以殘忍的毀滅與無情的驅逐為代價的，他們摧毀貧民窟，甚至那些永久性房屋也遭到剷除。……”而在深受失地之害卻一無所獲的人們當中，印共（毛）九大關於人民盡一切可能捍衛土地與房屋、堅決打退毀滅性野蠻“資本游牧部落”的呼籲將會產生何種感染力，可想而知。

事實上，印度某些開發項目引起的徵地糾紛當時便發展成為大規模群體性事件，乃至暴力衝突，造成了較多傷亡，典型如奧里薩邦努阿貢村鋼廠徵地糾紛、西孟加拉邦的南迪格拉姆徵地糾紛和辛古爾事件：

2006年1月2日，奧里薩邦賈吉普爾選區努阿貢村五百多居民抗議塔塔公司在當地徵地開闢經濟特區興建鋼廠，與警方發生暴力衝突，12人死亡。

南迪格拉姆村（Nandigram）屬於西孟加拉邦哈爾迪亞選區，西孟加拉邦政府原計劃在此徵地4050公頃開闢一個經濟特區，引進薩利姆公司建設石化工廠。當地約四萬名將因經濟特區計劃而失去土地的農民竭力阻止，毀壞公路，設置路障，與政府人員數次暴力衝突，拒絕其進入該地區達三個月之久。2007年3月14日，政府出動約二千警力驅逐示威者，與當地農民爆發衝突，警方使用了催淚瓦斯、橡皮子彈和燃燒彈，造成14名農民死亡，數十人受傷。3月18日，西孟加拉邦政府宣佈取消南迪格拉姆經濟特區計劃，薩利姆公司計劃中

的石化工廠遷往別處。

辛古爾村（Sigar）屬於西孟加拉邦胡格里選區，西孟加拉邦政府原計劃在此徵地 997 公頃，引進印度著名家族企業塔塔集團設廠生產微型汽車，引起大規模抗議活動。2006 年 12 月 2 日，西孟加拉邦地方警察開進辛古爾村強行圈地，與當地村民發生衝突，警方使用警棍等強行驅散人群並逮捕了 60 多名示威者，其中包括 18 名婦女和兩名兒童。西孟加拉邦最大反對黨草根國大黨主席瑪瑪塔·班納吉迅速宣佈絕食抗議，一些人權組織也紛紛指責當地政府和警方濫用權力，項目最終被迫撤出。

……

接連發生的徵地糾紛迫使印度中央政府一度凍結特區發展計劃，南迪格拉姆徵地糾紛和辛古爾事件更將印度國內關於徵地糾紛的爭議推向高潮，直接導致印共（馬）領導的邦政府陷入困局。本來，左翼陣線從 1977 年開始就在西孟加拉邦連續執政至今，是印度執政時間最長的地方政府，2000 年出任首席部長的巴塔查吉上臺後大力招商引資，成效頗著，2001~2006 年西孟加拉邦經濟增速為 7.3%，高於全國平均值，也提昇了印共（馬）和同樣主張走議會道路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印共的政治力量。2004 年，印共（馬）和印共在國會選舉中獲得鉅大成功，二者及其他左翼力量所獲選票之和超過了 60 張，這個數目雖然還不足以組織政府，卻對欲組成政府的大黨聯盟具有決定性的影響。2006 年西孟加拉邦選舉中印共（馬）更是勝利空前，左翼四黨在西孟邦議會 294 個議席中收穫 235 席，印共（馬）獨得 176 席。但巴塔查吉頗有新自由主義色彩的“親商”政策在印共（馬）黨內一直就有爭議，2007 年以來接連發生的徵地糾紛等事件更極大地損害了印共（馬）和印共與基層群眾的關係，成為印共兩大主流派在 2009 年 5 月落幕的人民院第 15 屆大選中遭受空前重創的主要原因。在這次選舉中，印共（馬）只贏得了 543 個議席中的 16 席，比

上屆銳減 27 席，甚至比 1967 年首次參選時還少三席，在全國性政黨排名中從第三大幅下滑至第八；印共也從 2004 年的十席減少到四席。

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只能是和平的產物，儘管在某些戰爭期間，某些局部地區出現過長足的經濟增長，如抗戰時期的陝甘寧邊區和二戰時的美國，但這些局部地區經濟之所以能夠在戰時出現增長，前提也是這些局部地區內部保持了和平。印度國內社會階級矛盾既然已經尖銳到暴力衝突乃至兵戎相見的地步，而且糾錯能力較差，對其經濟增長的威脅可想而知。

三、缺乏自主統一歷史的印度

面臨廣泛、複雜、深刻的民族和宗教矛盾威脅

（一）印度國內民族構成差異根深蒂固

不僅如此，印度在民族構成、語言文字方面的一致性遠遠不可與中國相比，在這方面的風險遠遠高於中國。中國人口中漢族佔絕對多數，而且在經濟、文化等方面均遙遙領先於少數民族，雖然經歷了近 30 年對漢族逆向歧視的少數民族優惠政策，但從 1953 年人口普查到 2000 年人口普查，漢族人口所佔比例仍然保持在 90% 以上（從 93.94% 下降到 91.59%）。²⁹ 而且，新中國成立以來，漢語在邊疆少數民族中的普及率、普通話在全國的普及率取得了史無前例的鉅大增長，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真正擁有了一種全國各地平民和精英在日常生活中廣泛使用的共同語言，在新疆等地撥亂反正重新推進雙語制教育，將進一步掃清全國普及這種共同語言不力的死角。與昔日多半局

²⁹ 見國家統計局：〈五次全國人口普查基本情況〉，《中國統計年鑑 2008》第 90 頁。

限於精英階層的中原雅音和官話相比，這樣一種共同語言將更有力地維護、鞏固這個國家的統一。從周朝開始牢固確立的世俗政治傳統，統一的語言文字，不僅降低了商業成本，更令中國在長期內保持著較高政治穩定性。

相反，印度本土民族歷史上不曾建立過囊括當今印度全境的統一國家，目前的統一國家是英國殖民者留給他們的遺產；而且印度至今仍是一個缺乏主體民族的多民族國家，沒有一個民族能夠佔據絕對多數，人口超過 2600 萬的大民族就有十個之多，最大民族印度斯坦族也僅佔全國人口的 46.3%，泰盧固族佔 8.6%，孟加拉族佔 7.7%，馬拉地族佔 7.6%，泰米爾族佔 7.4%，古吉拉特族 4.6%，坎拿達族 3.9%，馬拉雅拉姆族 3.9%，奧里雅族 3.8%，旁遮普族 2.3%。³⁰ 相應地，印度的語言文字異常繁雜，憲法承認的語言有十多種，登記註冊的達 1600 多種，語言文字高度不統一，雖然英語和印地語同為印度的官方語言，但作為本土語言的印地語使用反而不如外來語言英語廣泛，而作為一種外來語言的英語天然又迫使印度人要付出更多的語言成本，並在印度社會製造了深刻的階層鴻溝。某些論者將英語技能列為印度的發展優勢，對於輸出海外、為人作嫁的印度 IT 業勞動力而言，英語技能確實是一種優勢，但整個印度社會為取得這種“優勢”而付出了何種機會成本，兩者孰大孰小，明智者不難辨別。

不僅如此，由於印度少數民族在經濟等不少方面比最大民族印度斯坦族還擁有一定優勢，印度民族構成和語言文字的一致性很難顯著提高，顯著的差異將長期存在，印度奉行的西式代議制民主政體、西式民族理論和政策還將人為地維持、強化而不是消弭這種差異。

如印度經濟中心孟買貢獻了全印 10% 的工人崗位、40% 的所得稅、60% 的關稅、20% 的中央徵收特許權稅、40% 的對外貿易，以及四百億印度盧比（90 億美元）的社團稅，又是印度文化娛樂產業中

³⁰ 〈印度國家概況〉，外交部網站 2010 年 8 月。

心，印地語電影業中心寶萊塢及其最大攝影棚、印度大部分重要電視和衛星網絡以及主要出版社的總部都位於孟買，孟買南區雲集了衆多印度金融機構總部，包括孟買證券交易所、印度儲備銀行、印度國家證券交易所、印度政府造幣廠，以及許多商業性金融機構和外資銀行分支機構，但這座城市不是坐落在印度斯坦族主導地區，而是第四大民族馬拉地族主導的馬哈拉施特拉邦首府。1950 年代，印度各邦按語言重組，原孟買邦分割為馬拉地人主導的馬哈拉施特拉和古吉拉特人主導的古吉拉特兩個語言邦，兩大民族當時就曾為孟買市歸屬而爆發大規模騷亂和流血衝突，其間發生過警察開火擊斃 105 人的慘劇。即使沒有這樣的流血爭奪歷史，擁有如此實力的當地主導少數民族也會力圖永久把持相關利益，而不是與國內其他民族分享機遇，西式代議制民主政體和上述流血爭奪歷史又加劇了這種動機。因此，我們才看到，與中國大規模國內移民促進了普通話推廣不同（如大陸改革前的十堰和三明、改革後的深圳和東莞等移民城市及解放戰爭後的臺灣），在吸引了其它邦大批勞動力湧入、又是印地語影業中心的印度“夢想之城”孟買，不僅政府工作人員必須說馬拉地語，當地政客還時常通過、或揚言制定一些法律，強制要求出租車、電影等行業從業者說馬拉地語，1966 年成立的濕婆神軍黨更是開宗明義要捍衛“土地之子”（馬哈拉施特拉邦本地人）的權利，由此造成了一系列深刻社會矛盾，包括嚴重暴力事件。

與此相似，臺灣地區 90% 以上居民是漢族，而且本來早在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就已經普及普通話（國語），但在推行民主化改革、引進民選制度後，本已解決的語言問題重新成為焦點話題之一，國語和閩南話、客家話等方言之間的關係經常成為政客操弄的題材，由此造成了嚴重的社會撕裂。

（二）錯綜複雜的印度宗教矛盾及其破壞力

不僅如此，宗教對印度社會影響力鉅大，且印度居民宗教信仰極端蕪雜，約80.5%的居民信奉印度教，其次為伊斯蘭教（13.4%），基督教（2.3%），錫克教（1.9%），佛教（0.8%）和耆那教（0.4%）等，³¹而印度各宗教之間的歷史和現實恩怨錯綜複雜，給印度社會埋下了衆多“炸彈”。從延續數十年的克什米爾動亂到2008年11月震動世界的孟買恐怖襲擊案件，我們已經一次又一次看到了印度民族、宗教衝突所潛藏的鉅大破壞力。

居民以穆斯林為主的克什米爾數十年來一直是印度的傷口，也是印巴之爭的焦點，這已是世人皆知。1989年，反政府武裝“查謨和克什米爾解放陣線”綁架內政部長穆夫迪之女，引爆大規模武裝衝突，最終造成4.7萬人死亡，其後動蕩司空見慣，以至於一家常駐印度的西方媒體內部規定，克什米爾死傷十人以上才能做一條短新聞。³²2010年5月當地軍警開槍打死一名穆斯林少年後，當地反印示威幾乎無日無之，9月11日伊斯蘭教開齋節本來是傳統上較為“安全”的日子，印控克什米爾首府斯利那加卻爆發了1989年以來規模最大的分離主義暴亂。政治動亂、武裝衝突重創了這個昔日印度最富裕地區至關重要的旅遊業，並損害了整整一代人的教育，“動亂—貧困/教育打斷—動亂加劇”的惡性循環已經形成。

克什米爾暴亂雖然暴烈，但那裡畢竟是印度邊疆地帶，但像孟買這樣的印度腹心地帶、全國金融中心自1980年代以來也爆發逾40次恐怖事件，僅1993年和2006年兩次襲擊就造成數百人喪生、一千多人受傷致殘，其中2006年7月11日孟買火車連環爆炸案一次就造成逾二百人喪生，2008年11月26日伊斯蘭極端組織“德幹聖戰軍”武裝襲擊孟買，造成數百人死傷，更是震動世界，也更讓人看到印度民族宗教衝突的廣泛、深刻。即使在印度共產黨執政多年的喀

³¹ 〈印度國家概況〉，外交部網站2010年8月。

³² 〈印控克什米爾發生大騷亂〉，《環球時報》2010年9月13日，第16版。

拉拉邦，多年來一直被視為印度繁榮、教育程度最高的和平綠洲，2010年7月4日也發生了伊斯蘭極端組織印度人民陣線殘忍襲擊一所基督教大學教授T.J.約瑟夫的案件，受害者右手被砍掉。

而且，印度的民族、宗教衝突深深植根於歷史，又因現實人口結構和國際鬥爭背景而強化，因此，解決起來分外艱難。雖然印度次大陸最早的穆斯林社團是在今日印度南部沿海定居的和平通商者，但伊斯蘭教得以在印度次大陸躍居第二大宗教，卻主要是拜阿拉伯、突厥、波斯、蒙古、阿富汗等外來侵略者近千年間不斷發動“聖戰”征服所賜，伊斯蘭教和穆斯林也因此在很多印度教徒眼裡揹負上了不可寬恕的“原罪”。本來地域廣大的東南亞印度教社會遭到伊斯蘭教侵蝕征服而大面積改宗，進一步加重了印度教徒眼裡伊斯蘭教和穆斯林的這種“原罪”。印度次大陸大部分穆斯林是13~15世紀改宗伊斯蘭教的本地居民、前印度教徒後裔，其中原來的低種姓印度教徒居多；³³ 加上1947年印巴分治期間教派衝突，50萬人被殺，1400萬人無家可歸，印巴兩國迄今仍視對方為最大死敵；種姓歧視、國際政治鬥爭和宗教之爭糾結在一起，使得矛盾越發複雜、深刻。

在漫長的伊斯蘭統治時期，異族穆斯林統治者對印度教社會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數不勝數。莫臥爾王朝奧朗則布（1658~1707年）統治時期，對印度教實施赤裸裸的歧視、迫害政策，衆多印度教寺廟或被改建為清真寺，或被夷為平地，所屬土地轉賜穆斯林封建主，穆斯林封建主欠印度教徒的債務一概免除。1668年，奧朗則布宣佈取消對穆斯林商人的關稅；1679年，恢復阿克巴大帝（1556~1605年）

³³ 阿拉伯倭馬亞王朝將領穆罕默德·伊本·卡西姆711~713年間首次入侵印度次大陸時，最初向入侵者皈依伊斯蘭教的就是兩個賤民部落。1067年來自也門的傳教士阿布·阿拉，11~12世紀來自波斯阿拉穆特的傳教士奴爾丁，都曾在古吉拉特發展大批低種姓印度教徒入教。孟加拉蘇丹國（1336~1576年）統治的二百餘年間，每年都有大批低種姓印度教徒不堪忍受印度封建主壓迫、歧視而改宗伊斯蘭教，致使廣大農村地區穆斯林人數激增。

取消的異教徒人丁稅，佔農村人口絕大多數的印度教農民捐稅負擔一夜之間猛增三分之一；……³⁴ 這一切在印度教社會中深深播下了仇恨的種子，直至今日仍能不時爆發，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圍繞阿約提亞的巴布里清真寺屢屢爆發大規模騷亂，震驚世界，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究其根源，該地本是為了紀念印度大神羅摩在此降生而於 11 世紀興建的印度教寺廟，莫臥爾王朝建立之初的 1528 年，來自中亞的異族穆斯林軍隊在巴布爾下屬巴奇率領下拆毀印度教寺廟，在原址建起巴布里清真寺，從此埋下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圍繞該地爭鬥近五百年的火種：

1853 年，印度教徒與穆斯林衝突造成 75 人喪生。

1857 年，一位印度教祭司在巴布里清真寺院內一角豎起印度教聖壇，吸引了大批印度教徒祈禱，印度教徒與穆斯林在祈禱時雖未公開衝突，但始終怒目相視。

1859 年，英國殖民政府在印度教聖壇與清真寺之間築牆隔離印度教徒和穆斯林。

1934 年，印度全國爆發印度教徒與穆斯林衝突，巴布里清真寺部分牆壁和圓頂遭破壞。

1947 年印巴分治後教派衝突期間，印度教徒利用自己教徒眾多的優勢，不時在阿約提亞挑起糾紛。1949 年，一些印度教徒強行進入巴布里清真寺，並在那裡豎起了羅摩像。印度政府宣佈阿約提亞為有爭議地方，關閉了那裡的建築，在周圍架起了鐵絲網。

1980 年，印度教色彩濃厚的印度人民黨正式成立，並提出“一個民族，一種宗教”的口號。1983 年，世界印度教大會倡議在巴布里清真寺地址上建立印度教廟，在印度教徒中引起了熱烈反響。1984 年，解放羅摩誕生地委員會正式成立，其宗旨就是在此地建立印度教廟，主要組織者、印度人民黨頭面人物阿德瓦尼後任印度內政部長。

³⁴ 任繼愈總主編、金宜久主編：《伊斯蘭教史》第 393~394 頁。

1986年，北方邦法伊扎巴德地方法官命令打開巴布里清真寺院門，讓印度教徒進去朝拜羅摩神像。

1989年，拉吉夫·甘地政府允許在無爭議的沙蘭亞斯建立印度教廟，沙蘭亞斯就在巴布里清真寺旁邊，引起穆斯林強烈不滿，隨後的宗教衝突導致五百多人死亡。同年，世界印度教大會發起運動，在巴布里清真寺附近為羅摩廟奠基。

1990年，印度人民黨主席阿德瓦尼乘車演說，號召印度教徒支持重建羅摩廟，約十萬志願者在阿約提亞集會，有些印度教極端分子衝進巴布里清真寺，警察開槍射擊，30多人死亡，隨後的衝突又導致數百人傷亡。

1992年7月，印度教徒舉行羅摩廟開工儀式，但並未騷擾巴布里清真寺。1992年12月6日，巴布里清真寺被印度教徒極端分子搗毀，電視現場直播的搗毀活動引發全國宗教衝突，二千多人死亡，震動世界。

2002年1月，世界印度教大會宣佈，儘管印度最高法院禁止在阿約提亞興建印度教廟，他們依然要動工興建，當時有1.5萬志願者到場。2月27日，一些印度教徒舉行宗教儀式後乘火車返回古吉拉特，在戈德拉火車站遭到穆斯林極端分子襲擊，極端分子縱火燒毀火車，55名印度教徒死亡。在縱火案引發的古吉拉特邦騷亂中，又有七百多人死亡。

2010年9月30日，印度北方邦高等法院認定阿約提亞巴布里清真寺所在場所確是印度教神羅摩出生地，裁決將阿約提亞宗教遺址一分為三，穆斯林、印度教徒和當地教派各得一部分，期望借此徹底解決阿約提亞寺廟之爭，但印度政府當天便派出大量安全人員在當地和孟買等城市強化戒備，卻表明印度教和伊斯蘭教兩大教派之爭何其根深蒂固。在重重戒備下，當年12月7日，正在舉行日常宗教活動的北方邦瓦拉納西城一座廟宇外仍發生炸彈爆炸事件，引發踩踏，造成

一名兩歲女童死亡，約 20 人受傷，傷者中有至少兩名外國人，新德里、孟買等重要城市當天進入高度戒備狀態，印度恐怖組織“印度聖戰者”則向多家媒體發送電子郵件，宣稱自己製造了瓦拉納西恐怖襲擊事件，目的是報復上述關於巴布里清真寺的裁決。

錫克教興起於穆斯林入侵印度次大陸通道和最早據點之一的旁遮普，創始人那納克（1469~1539 年）原屬印度教商業種姓，所創宗教本身就是對伊斯蘭異族異教統治的反抗。從二世始祖安格德（1504~1552 年）起，錫克教就開始嚴厲排斥伊斯蘭教，拒絕使用流行於旁遮普語裡的阿拉伯文字體，而是採用古印地語和旁遮普語的混合語佈道說教。從五世始祖阿爾瓊（1563~1606 年）時代起，錫克教徒就不斷舉行暴動，反抗穆斯林莫臥爾王朝統治，僅 1705 年爆發的旁遮普錫克教徒起義就持續十年之久。與此同時，英迪拉·甘地夫人下令進攻金廟以及其後被錫克族衛兵刺殺，又在印度教和錫克教之間播種了敵對情緒。

……

（三）民族構成、語言文字和宗教信仰嚴重缺乏一致性的鉅大政治性風險

民族構成、語言文字和宗教信仰嚴重缺乏一致性不僅提高了商業成本，更從國內、國際兩個方面大大提高了印度在長期內的政治性風險。因為與單一民族聚居或單一民族佔壓倒多數聚居相比，多民族混居相互摩擦和激化的幾率天然較高，不僅語言不同容易造成誤解，宗教和風俗不同可能產生摩擦，而且單一民族聚居情況下個體之間的摩擦此時也容易上昇到群體衝突、乃至民族衝突的層次，甚至可能進而轉為對分疆裂土的訴求。特別是阿薩姆邦等少數民族聚居區擁有數百年、上千年獨立國家歷史，與印度本土人種、語言文化傳統均大相徑

庭，直到晚近時期方才被英印殖民政府武力征服，強行納入當代印度版圖，與印度本土至今缺乏緊密的人文和經濟聯繫，昔日作為主人的土著又受到印度本土移民歧視，甚至被印度本土種姓社會中最低賤種姓首陀羅視為更加等而下之的賤民，更是民族獨立和分離運動的天然溫床。

事實上，在阿薩姆邦、“東北邊區”（包括麥克馬洪線以南的印佔中國藏南地區）、印緬邊境等地區離心力一直較強，某些非暴力地方民族主義運動已有逾百年歷史，並在國外贏得了一定同情和支持，而且多年來始終存在活躍的少數民族反政府武裝，已經超越“星星之火”階段，屬於漢藏語系的那加族反政府武裝尤為活躍，使印度軍警日益疲於奔命，以崇拜核彈、導彈、航母而聞名的印度強硬派前國防部長費爾南德斯在下臺前不得不提議在尼泊爾、印度邊境駐兵設營，企圖返回傳統的“低科技”對策。由於近年來印度人口中印度教徒所佔比重下降而穆斯林佔比上昇，也加大了印度爆發民族、宗教衝突的風險。

與此同時，在存在跨境民族的情況下，一個跨境民族在某一聚居國內遭遇的衝突會在另一聚居國的本民族同胞中激起共鳴和騷動，這本來是正常情感所致，假如這個跨境民族在未爆發衝突的聚居國中為數甚微，該跨境民族完全沒有可能將這個聚居國拖進對本國不利的鄰國衝突之中，但假如這個跨境民族在未爆發衝突的聚居國中為數甚多，其政治影響力就有可能將這個聚居國拖進對本國不利的鄰國衝突，從而虛耗國力。這一點，我們從印度捲入斯里蘭卡民族衝突遭受重大損失中已經可見一斑。更有甚者，在本國民族構成、語言文字一致性低下的情況下，印度政府仍然對鄰國、特別是對綜合國力遠遠超過自己的大鄰國不斷操弄民族矛盾武器，進一步大大提高了引火燒身的風險。

四、印度政府無力消滅反政府武裝 並爭奪民心、剷除其發展土壤

（一）印度政府軍不堪任用

任何國家都存在種種社會矛盾，武裝力量是維持秩序的終極手段；面對已經公開交戰的反政府武裝，武裝力量的戰鬥力更決定了一個國家的秩序。印度政府已於 2009 年 6 月將印共（毛）列為非法組織，與伊斯蘭恐怖主義組織並列；2009 年 10 月底，新任印度內政部長帕拉尼亞潘·奇丹巴拉姆³⁵ 更宣佈在全國實施全面清剿印共（毛）武裝的“綠色狩獵”計劃，計劃投入三百億美元更新武器裝備，五年內肅清印共（毛）武裝。但通觀 2010 年 4 月 6 日切蒂斯格爾邦丹特瓦達之戰全程，³⁶ 可以得出結論：印度武裝力量的戰鬥力和戰鬥意志不堪信任；換言之，該國政府維持秩序的能力很成問題。

隸屬內政部的印度中央後備警察部隊號稱全世界最大安全部隊，而作為安全部隊高官護衛連隊，2010 年 4 月 6 日丹特瓦達之戰中參戰的印度政府軍當屬精銳，何況其中還有一部分眼鏡蛇特種部隊官兵，其裝備優勢也顯而易見。伏擊者兵力優勢則並不大，政府軍有一百餘人，而根據以印共（毛）丹特瓦達特區政治局書記科薩名義發佈的公開信，參戰的“人民解放游擊軍”為三百人。但政府軍一戰陣亡 86 人（包括戰鬥結束後救治無效死亡的九人），被當場擊斃的眼鏡蛇特種部隊就有 15 名，對方則僅有八人戰死，而且傷員和遺體全部帶回，以至於外界起初以為印共（毛）此戰無陣亡，表明無論是單兵還是小部隊作戰能力，印度政府軍相對於反政府武裝均無優勢；圍剿

³⁵ Palaniappan Chidambaram，因此前在財政部長任上大力推行市場化改革而在西方輿論中享有“盛譽”。

³⁶ 印共（毛）武裝稱之為“丹特瓦達大捷”。

部隊反而落入對方包圍圈，表明印度政府軍指揮和偵察能力低下；軍營與戰場相距僅僅四公里，救援部隊竟然足足五個小時之後方才到達，表明印度政府軍相互救援的軍紀、戰友情誼和勇氣嚴重欠缺；……從這些表現來看，這樣的軍隊已經堪與抗戰末期豫湘桂戰役大潰敗和解放戰爭中的國軍相提並論。丹特瓦達之戰後印度《每日新聞與分析》³⁷等媒體對當事軍營的一系列直接採訪也讓人們對印度政府軍士氣低落、設施陳舊、後勤不良、官兵關係惡劣的破敗景象一覽無餘，其軍紀之廢弛更令人震驚：一座剛剛經歷了震動國內外敗仗的軍營，記者居然可以未經預約就靠指揮官個人好惡而大搖大擺進入，隨意走動、觀察，還可以與士兵隨意接觸！³⁸對比西漢周亞夫的細柳營到現代強軍的一系列案例，這支軍隊的戰鬥力可想而知。

與中國革命時期紅軍和解放軍稱國軍為“運輸大隊長”類似，印共（毛）等反政府武裝相當大一部分裝備也是來自繳獲。丹特瓦達之戰繳獲裝備包括 21 支 AK~47、七支 SLR 步槍、六挺輕機槍、一支卡賓槍、一門迫擊炮，以及 38 件其它武器。前兩年印共（毛）一次戰鬥佔領了一座小城鎮戈拉布德，更一夜之間就從警察局軍火庫繳獲了 268 支 AK~47 步槍和 1.7 萬發子彈。

當然，丹特瓦達之戰中參戰印度政府軍大部分不是野戰軍而是安全部隊，但考慮到印度軍隊在後勤、軍紀等方面醜聞不斷，³⁹我們

³⁷ *Daily News & Analysis*，縮寫為“DNA”。

³⁸ Priyanka Borpujari：〈把我們救出地獄〉(Save us from this hell, beg CRPF jawans)，印度《每日新聞與分析》(DNA)網站(http://www.dnaindia.com/india/report_save-us-from-this-hell-beg-crpf-jawans_1372607)。

³⁹ 印度軍隊在軍需品採購、性賄賂等方面向來不乏腐敗醜聞，有些醜聞相當驚人。如 2006 年爆出的陸軍後勤醜聞，為了攫取回扣，印度陸軍一些高級後勤軍官竟然長期採購牲畜飼料充當官兵口糧；1980 年代博福斯醜聞更牽連到時任總理拉吉夫·甘地。而且，這類腐敗傳聞即使得到披露，也大多得不到有效處置。2005 年 6 月，印度前國防部長費爾南德斯被指在任職期間從南非一家公司的步槍軍購合同中收受鉅額賄賂，辛格政府還為此專門成立了調查小組，但最終與其它衆多腐敗案件一樣不了了之。2010

對印度野戰軍的戰鬥力也不應估計過高。事實上，根據英國廣播公司 2004 年的報道，印共（毛）武裝 2003 年還曾經伏擊了接受美國特種部隊高原山地戰訓練的印度陸軍山地戰特種部隊，用弓箭射殺了他們好幾個哨兵，嚇得他們次日一早便乘直昇機逃離。

而且，印度武裝力量拙劣的作戰表現並不始於對印共（毛）的戰鬥，在 2008 年 11 月 26~28 日孟買恐怖襲擊案中，印度軍警的無能在對付伊斯蘭恐怖分子時就已經暴露無遺，在孟買這座僅 1980 年代以來就遭受 40 多次恐怖襲擊、即將召開大型國際會議“歐盟~印度會議”的印度第一大城市，號稱“黑貓突擊隊”的印度國家安全衛隊（NSG）居然需要九個多小時方能投入實戰，被外界譏為“病貓”；不少政府軍警還手持 1895~1956 年間作為英軍制式裝備的李~恩菲爾德步槍（Lee-Enfield），無法與恐怖分子的火力匹敵，連孟買反恐特種部隊司令也死於恐怖分子槍下。結果，區區十名恐怖分子就在孟買市中心橫行三天之久，僅喪生者就有 166 人。

在與反政府武裝的作戰中，印度軍警不僅表現得戰鬥力低下，戰鬥意志也相當衰敗，從許多公開報道中我們都不難看到這一點。據《印度時報》2010 年 4 月 12 日報道，以往清剿毛派武裝時都是由當地警察帶路，印度中央後備警察部隊負責作戰，但在丹特瓦達之戰遭受重創之後，印度武警備受“震懾”，⁴⁰ 一度停止作戰，不敢繼續隨當地警察參加掃蕩。另外一些有關報道則表明，印度不少警察部隊鎮壓印共（毛）武裝屢敗之餘，已經喪失了作戰的鬥志，警方每隔兩週左

年 10 月下旬以來，印度軍方再次曝出腐敗大案，印度前兩任陸軍參謀長維吉和迪帕·卡普爾等多名陸海軍將領都涉嫌捲入。據 2010 年 10 月 25 日《印度時報》報道，維吉、迪帕·卡普爾以及眾多其他陸海軍將領、政客和官員在孟買的阿達什訥區非法擁有多處房產，甚至包括孟買克拉巴區一棟 31 層大樓。即使一向形象良好的印度空軍也爆出了性醜聞，空軍學院教官以畢業證書等相威脅向多名女學員提出性要求，受害者在事件披露後也未能為自己討回公道。

⁴⁰ 原文為“shocked”，系援引切蒂斯格爾邦警察廳官員語。

右就對叢林放空槍以交差，而不是投入實際戰鬥。更有甚者，印度很多地方腐敗不堪的軍警系統還走上了“養寇自重”的道路，他們將受命鎮壓反政府武裝視為向政府索取大量裝備的良機，其中一部分裝備又被他們賣給反政府武裝以“創收”。這般景象，在中國通常是王朝末年才能見到。軍隊戰鬥意志和戰鬥力如此狀況，印度政客和媒體卻仍然喜好張大其詞，動輒挑釁別國，更給印度的未來投下了難以言說的憂患。

在井岡山時期寫作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一文中，毛澤東指出，由於當時中國白色政權的分裂和戰爭持續不斷，小塊紅色政權得以發生、存在並日益發展；與此類似，印度的聯邦制政體給印共（毛）等反政府武裝提供了衆多可供利用的縫隙。在印度的聯邦制政體下，各邦自主權較大，配合不甚緊密、高效，而對反政府武裝的清剿又主要由各邦具體執行，中央後備警察部隊僅對各邦的清剿行動提供支持和幫助，其結果是各邦清剿行動步驟和力度不一，為反政府武裝靈活運用“敵進我退”的游擊戰術創造了便利。由於各邦主政者對此三心二意，這類漏洞越發增多。

置身這樣的環境，面對這樣的對手，無怪乎印共（毛）人民解放游擊軍被越剿越多，勢力和活動範圍越來越大，近年還提出了建立根據地的中心任務，並努力將游擊戰轉化成運動戰、將人民游擊軍轉變成人民解放軍。

（二）印共（毛）等反政府武裝

在政治理論和社會治理實踐方面挑戰現行政治秩序

軍隊戰鬥力虛弱，各邦政府配合較差，尚且可以通過整頓增強；但假如對手不是打家劫舍的草賊流寇，而是擁有成熟政治理論、能夠提供更好社會治理的政治力量，這樣的反政府武裝就很難撲滅了，印

度現行政治秩序面臨的正是這樣的挑戰。

儘管行動不無偏頗之處，而且被印度政府乃至美國政府蓄意污名為“恐怖組織”，將極右武裝、穆斯林武裝和虔誠軍等組織製造的暴力事件和死亡移花接木安到印共（毛）頭上，⁴¹ 儘量隨著力量壯大不可避免會有投機分子和渣滓混入，但與被印度中央政府乃至美國政府列入恐怖組織的其它黨派和武裝不同，印共（毛）並非一介草莽，其前身本來就是在相當系統的政治理論指導下問世的，在吸取中國革命成熟理論的基礎上，積自身數十年實踐之功，逐步發展形成了完整的指導武裝鬥爭的理論框架。2007年1月，印共（毛）在秘密召開的全國第九次代表大會上通過了指導該黨今後工作的五個綱領性文件——《高舉馬列毛主義的光輝旗幟》、《黨綱》、《黨章》、《印度革命的戰略和策略》以及《關於當前國內外形勢的決議》。在《黨章》中，印共（毛）決心以“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主義”作為其指導思想，堅持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在此基礎上，印共（毛）將自己的奮鬥目標劃分為三個階段：近期目標是建立一個緊湊的紅色革命區域，這個區域從尼泊爾邊界到比哈爾邦再延伸到安得拉邦，同時尋求人民民主；中期目標是作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在印度繼續開展

⁴¹ 印共（毛）前身之一人民戰爭集團（PWG）於2004年被美國列入恐怖組織黑名單。印度內政部把印度全國91%的暴力事件和89%的暴力事件死亡人數都歸咎於印共（毛），聲稱印共（毛）自2004年以來已發動了六千餘起暴力事件，造成至少2500人死亡。但按照印共（毛）內部統計，2004年以來大部分暴力事件並不是印共（毛）及其武裝部隊人民解放游擊軍製造的，針對公共設施和平民的暴力事件主要是由極端右翼組織、穆斯林武裝和虔誠軍製造的，人民解放游擊軍打擊的對象主要是中央政府和邦政府部門、印度國防軍和警察部隊、鎮壓被當地絕大部分老百姓投訴的地主和礦主，從不針對公共設施、民用建築和平民發動暴力事件，2004~2009年中打死國防軍特種部隊430多人，警察特種部隊120多人，鎮壓地主、礦主20多人、打死邦政府高官二人，其他國防軍和警察一百多人，共計約670多人，印度政府公佈的2500多人死亡中近三分之二系極右武裝、穆斯林武裝和虔誠軍所為，但被印度政府算到了印共（毛）的頭上。此外，不排除有些犯罪分子打著印共（毛）的旗號敲詐勒索乃至殺人越貨，印度警方也有可能蓄意作案然後嫁禍於人，以敗壞印共（毛）的聲望。

已在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以“間接統治、剝削和控制”為形式的新殖民主義；終極目標是通過長期武裝鬥爭奪取政權，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在印共（毛）政治局 2009 年 9 月發佈的黨內通信中，稱他們建立的政權組織“革命人民委員會”（janathana sarkars）是“建立在民主基礎上、以人為本和基於當地資源的新型權力運作模式”；該黨在提供更好社會治理方面的許多實踐確也令人刮目相看。通稱“納薩爾巴里運動”的印度毛派農民革命戰爭游擊運動興起於 1967 年，之所以能夠在重重包圍之中 43 年紅旗不倒，反而發展壯大，就是因為廣大貧苦階層無以為生、基本人權被剝奪而被逼上梁山，印共（毛）不僅擁有系統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理論武裝，在實踐中又實施了減租、懲處貪官污吏、建立“人民法庭”等一系列正確的方針政策，讓廣大貧苦階層得到了鬥爭的實惠，並為其控制的“解放區”提供了更好的社會治理。

據中國學者溫鐵軍在其〈印度北方農民運動和“毛派”武裝鬥爭考察報告〉中總結，印共（毛）的方針政策有幾個基本特點：迫使地主減租 50%，其中一半留給佃農，另一半分給窮人；解除地主階級私人武裝，剝奪他們對群眾橫徵暴斂、欺壓無度的工具；他們逼迫貪官污吏交出 25~30% 貪污所得，大部分用於救濟貧苦農民，小部分用於自身開支；他們建立的“人民法庭”能夠有效懲處刑事犯罪，特別是在其他地區極其嚴重的對婦女的暴力和犯罪，在他們的控制區大幅度下降；……在他在印度農村地區召開的座談會中，上述情況得到了一致公認。⁴² 持公正客觀立場的印度國內外觀察家們都承認，在印共（毛）等毛派組織活躍的核心地帶，他們被視為正義與平等的化身而廣受尊重和敬畏，在實地考察中，當地不同背景和階層的受訪者一致表示，毛派“人民法庭”的懲罰是正義的，他們只針對罪有應得的

⁴² 載於張文木：《印度國家發展潛力及其潛力評估》。

罪犯。

不僅如此，印度幾乎所有政黨都以某些種姓或群體為固定票源，印共（毛）武裝和印度其它主流共產主義組織則體現了跨種姓和群體的特點：成員來自各個種姓和群體，領導人一般出身於高種姓和富裕階層，⁴³ 但他們與印度衆多種姓中的最低種姓群體同甘共苦，沒有表現出任何高人一等的優越感，不管政治立場如何，持公正客觀立場的印度國內外觀察家們都不能不對這一點表示讚賞。

相反，支持印度政府鎮壓印共（毛）武裝的地主階級不僅橫徵暴斂，他們建立的民團對低種姓村民、婦女和兒童的殘酷殺戮更是罄竹難書；印度政府機構則是貪污腐敗橫行，軍警擾民成性。印度媒體有報道稱 2010 年 4 月 6 日丹特瓦達之戰之所以爆發，直接原因就是印度中央警察預備部隊前一天在附近村莊搶奪當地農民的雞和碗而不給錢，當地農民的怨聲又很快傳到了印共（毛）武裝耳裡；而根據丹特瓦達之戰後以印共（毛）丹特瓦達特區政治局書記科薩名義發佈的公開信，印度政府軍在掃蕩中採用了燒殺搶掠和強姦婦女等暴虐手段驅逐根據地群眾，僅此次掃蕩中就有十個村莊的 76 名婦女遭政府軍強姦。

支持印度政府鎮壓印共（毛）武裝的地主武裝和政府軍警殺害、驅逐平民總體情況如何，就筆者所見，目前還沒有公開的系統、全面的調查統計，何況印度從來不以社會基礎設施完備、政府高效而聞名，幾乎大部分統計數據準確性都值得懷疑，媒體報道也不完全。印度報紙對反政府武裝的歧視性報道自不待言，由於印度是“民主國家”，所以多年來把持國際輿論話語權力的西方媒體也只報道印度警察和安全部隊如何遭到襲擊，卻不報道他們如何鎮壓農民（毛派與農民結成一體），遑論報道印度平民在政府軍警清剿行動中的死亡人數了。印度知名女作家阿蘭達蒂·羅伊在美國演講中稱在近年的清剿中印度

⁴³ 因為他們的出身使他們有機會得到較好的教育。

已經死亡六萬人，⁴⁴ 雖然這個數字未必準確，可能誇大也可能不足，但結合多方面信息，可以確定的是，就總體而言，印度平民在政府軍的清剿行動中蒙受了可觀的生命和財產損失。

兩相比較，無怪乎印共（毛）武裝不僅在農村和中小城鎮基層群眾中贏得了廣泛支持，而且在高級知識分子、官員等社會中上層人士中也不乏明確的同情者。正由於這一點，印度執政黨與政府對印共（毛）的態度頗富諷刺意味：一方面，印度政府明確將印共（毛）列為非法組織並發動了全國性圍剿，現任總理曼莫漢·辛格（Manmohan Singh）稱之為“國內最大安全威脅”，軍警部隊和各級政府在鎮壓行動中也不乏極端行為。印共（毛）及其同情者方面指責印度政府每年僅秘密處決的印共（毛）黨員、人民解放游擊軍戰士、同情者甚至無辜者就高達 600~1000 人，到 2009 年 6 月共秘密處死近 5600 多人，這個數字還不包括交戰過程中的傷亡和抓捕後經過法律程序的。

另一方面，印度歷屆中央政府及其執政黨深知印共（毛）已經贏得了廣泛支持，擔心動用野戰軍鎮壓印共（毛）武裝會導致自己流失草根階層選票，也害怕會因此戳破他們對外精心炮製的“印度大放光芒”（India Shining）形象，在國內外經濟界引發鉅大震動，因而一直反對全面動員國防軍野戰部隊打擊印共（毛）武裝。雖然印度內政部長奇丹巴拉姆於 2010 年 5 月提出希望動用國防軍野戰部隊圍剿印共（毛），但在 6 月 11 日的內閣安全委員會會議上，⁴⁵ 總理辛格、財政部長穆克吉、國防部長安東尼等要員均反對奇丹巴拉姆的提議，連派遣野戰軍建立前沿指揮部、培訓警察部隊等建議也沒有採納，僅同意僱傭退伍軍人參與排雷等部分軍事行動。在地方政府層次，決策

⁴⁴ 這條消息來自王紹光的通訊。

⁴⁵ 內閣安全委員會會議是印度政府內最重要的部長聯席會議，類似聯合國安理會，議定有關國家安全的重大事項。會議成員固定為六名，主持者為總理，成員包括內政部長、外交部長、國防部長、財政部長和國家安全顧問，三軍司令有時列席參加。

者們對鎮壓印共（毛）更不得不三心二意，左右搖擺，因為如上文所述，在印共（毛）武裝活躍的邦，多年來主流政黨要想競選獲勝就必須贏得毛派支持，至少是不抵制。⁴⁶

這種廣泛的支持、特別是基層群眾的支持令印共（毛）及其武裝力量得到了多方面好處：首先是如同中國革命戰爭中那樣令革命武裝如魚得水，耳聰目明，丹特瓦達之戰前政府軍一舉一動盡在印共（毛）眼裡，鎮壓革命軍的政府軍則寸步難行，閉目塞聽。其次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印度政府，使之無法全面動員野戰軍全力鎮壓，儘管印度特種部隊等正規軍曾先後與印共（毛）武裝小規模交手。

既然印度社會階級矛盾如此尖銳，印度政治卻立足於壓迫者、剝削者群體的支持，反政府武裝又能如此深得民心，那麼可以斷言，雖然印共（毛）之類反政府武裝在可預見的未來不太容易奪取全國政權，但印度政府也難以消滅他們，更無法剷除反政府武裝“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土壤。印度國內和平將長期面臨考驗，而可持續發展只能是和平的產物。

五、造就反政府武裝的極度貧困和社會不公 同樣威脅印度內需主導經濟增長模式

在“全球經濟失衡”成為熱門話題的背景下，近年來國內外頗有人認為內需、特別是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較多，這是印度經濟相對於

⁴⁶ 據亞洲時報在線報道，2005年初，比哈爾邦鐵腕人物、執政黨首腦雅達夫在該邦首府巴特那（Patna）的一次集會計劃流產，原因是他此前不允許毛派舉行一次集會而激怒了他們，而他的執政黨之所以能夠連續四年贏得比哈爾邦選舉，也正是因為他能在每次選舉前與毛派達成協定。以國大黨為首的聯盟之所以能夠贏得安得拉邦2004年選舉，是因為毛派沒有在國大黨及其同盟有望獲勝的地區宣佈抵制大選（Sultan Shahin：〈為何印度政府撲滅不了印度的毛澤東主義者革命武裝？〉亞洲時報在線2005年1月25日）。

中國經濟的一大優勢。此說流傳之廣，以至於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先生 2006 年 12 月 15 日借來華參加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之機到中國社科院演講時，也不忘向中國聽眾推銷印度模式，要求中國“以印為師”擴大消費：“今天中國的 GDP 約有一半貢獻給了投資和為世界其他國家生產淨出口，僅有剩下的一半可用於消費，這其中還包括政府消費。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去年中國的消費僅佔 GDP 的 38%，比起 2001 年 45% 的水平下滑了。根據最新獲得的數據進行對比，2004 年印度的居民消費佔到其 GDP 的 60%。中國的消費佔 GDP 的低比例對應於高比例的國民儲蓄率。”印度官方聲稱印度擁有三億中產階級，這種說法也被中國某些學者用作論據抨擊中國經濟社會的“缺陷”。

然而，且不提儲蓄和投資過去、現在、未來都是經濟增長的源泉，發展中國家尤其需要具備較強的積累和投資能力方能趕超發達國家，也不說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下經常項目順差是一國宏觀經濟穩定的關鍵要素之一，鑒於印度反政府武裝興起壯大的根源在於極度貧困和社會不公，印度自誇的內需主導經濟增長模式成色幾何，究竟能否與中國相比，殊堪質疑。

（一）低收入削弱了印度消費拉動經濟的力量

前文已經提及印度居高不下的貧困人口比重和全部人口營養不良發生率，即使是印度所謂中產階級，其收入、生活標準和人數也不可與中國同一階層居民相提並論。印度應用經濟研究委員會是印度中產階級標準的制訂和發佈者，其發佈的印度中產階級標準是：年均稅後收入在 3.375 萬盧比到 15 萬盧比（約合 700~3000 美元，目前美元對盧比的比價為 1 兌 48.5 左右）的家庭即算是中產階級家庭。按此標準衡量，2001 年印度已有六千萬個家庭躍昇為中產階級家庭，以一家五口計算，印度目前有中產階級三億人。按 2000 年美元對盧比

匯率期末價 1 兌 46.75、2001 年人民幣兌美元年均匯率為 8.2770 元近似折算，⁴⁷ 人民幣 1 元約合 5.6482 印度盧比，五口之家年均稅後收入 5975~26557 元便可算中產階級家庭，換言之，人均稅收年收入達到人民幣 1195 元即可算作印度中產階級家庭。而在 2001 年同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 6859.6 元，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 2366.4 元，⁴⁸ 若按印度標準衡量，估計中國 95% 以上居民都可算作中產階級了。2005 年，印度應用經濟研究委員會的一項報告將中產階級年收入區間提高到 9~100 萬盧比；⁴⁹ 而到 2008 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達 15780.8 元，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 4760.6 元。⁵⁰

測度亞太區域中產階級的統一標準中影響較大的是亞洲開發銀行 2010 年度《亞太關鍵指標》(*Key Indicators For Asia And Pacific*) 報告擬定的亞太地區中產階級 (middle class) 標準，該報告將亞太區域中產階級界定為日均消費 2~20 美元 (按 2005 年購買力平價折算) 者，根據該機構計算，2005 年中國人口 62.68% 列入這一群體，印度這一群體僅佔總人口的 25.05%，與烏茲別克斯坦、老撾、尼泊爾、孟加拉國名列該機構測算的亞太區域 21 國中中產階級人口比重最低的五國 (參見表~3)。進一步考察按這個標準測算的中產階級內部構成，中國的構成也優於印度。與中國相比，無論是按照絕對人數、佔總人口比重還是佔中產階級總人數比重衡量，印度中產階級中都是劃入中下階層 (日均消費 2~4 美元) 者多，劃入“中中” (日均消費 4~10 美元) 和“中上” (日均消費 10~20 美元) 階層者少。

收入水平過低極大地限制了印度居民的消費能力，使之無法為很

⁴⁷ 2000 年末印度盧比兌美元匯率數據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庫 (轉引自國家統計局：《國際統計年鑑 2009》第 207 頁)；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引自國家外匯管理局：《2009 上半年中國國際收支報告》，第 107~109 頁。

⁴⁸ 國家統計局：《新中國 60 年》第 627 頁。

⁴⁹ 陳金英：〈經濟改革以來印度中產階級的現狀〉，《南亞研究》2010 年第 3 期。

⁵⁰ 國家統計局：《新中國 60 年》第 627 頁。

大一部分(即使不是絕大部分)現代製造業產品提供足夠規模的消費市場。按 2000 年不變價計算, 2006 年中國人均住戶最終消費支出為 651 美元, 印度為 374 美元, 相當於中國的 57%; 世界平均為 3486 美元(2005 年數據), 低收入國家為 279 美元, 高收入國家為 1.7238 萬美元。⁵¹ 按照亞行測算, 就作為現代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最重要消費者群體的中產階級而言, 2005 年中、印這兩個群體按購買力平價折算的消費額分別為 6412.5 億美元和 1724.6 億美元(參見表~3), 中國是印度同一指標的 3.7 倍。

表~3：亞洲開發銀行中印中產階級對比, 2005 年

國家	指標	2~4 美元	4~10 美元	10~20 美元	中產階級合計	20 美元以上
中國	人數(萬人)	44282	32818	4616	81716	886
	佔總人口比重	33.97%	25.17%	3.54%	62.68%	0.68%
	佔中產階級比重	54.19%	40.16%	5.65%	100%	—
	年消費額(億美元)	2337.2	3119.6	955.7	6412.5	372.7
印度	人數(萬人)	22382	4541	490	27413	114
	佔總人口比重	20.45%	4.15%	0.45%	25.05%	0.10%
	佔中產階級比重	81.65%	16.57%	1.78%	100%	—
	年消費額(億美元)	1171.1	443.9	109.6	1724.6	99.5

註釋：測度指標為按 2005 年購買力平價折算的日均消費額。

資料來源：根據亞洲開發銀行(ADB)：2010 年《亞太關鍵指標》(Key Indicators For Asia And Pacific) 第 8 頁數據計算。

正是依靠較高的收入和消費能力, 中國國內消費需求不僅絕對規模大大高於印度, 增長率也很快。2000~2009 年間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幅依次為 9.7%、10.1%、11.8%、9.1%、13.3%、12.9%、13.7%、16.8%、21.6% 和 15.5%, 2009 年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 12.53 萬億元, 其中對應於可貿易品的批發和零售業為 10.54 萬億元, 按 2009 年年末人民幣匯率(中間價)1 美元兌人民幣 6.8282 元計算, 折合 1.5438 萬億美元, 相當於當年我國貨物貿易出口總額 1.2017 萬

⁵¹ 世界銀行數據庫數據, 引自國家統計局：《國際統計年鑑 2009》第 230 頁。

億美元的 128%，一般貿易出口總額 5298 億美元的 291%。再考慮到近 30 年來中國貨物和服務淨出口對國內生產總值貢獻率最高的年份離現在已有一二十年，分別是 1990 年 (50.4%)、1997 年 (44.4%) 和 1989 年 (44.0%)，2000~2009 年間該項指標依次為 14.5%、-0.1%、7.6%、1.0%、6.0%、23.1%、16.1%、18.1%、9.0% 和 -47.7%，⁵² 最高也沒有達到四分之一，中國對外部市場的依賴性並不如同某些人所描述或想像的那樣高。

(二) 鉅富天量財富損害印度政治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

收入分配嚴重不均進一步惡化了印度國內產業發展中的消費拉力不足問題。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收入和財富分配較為平均有利於拉動國內產業發展，因為高收入者消費偏好更傾向於品質和品牌形象更為突出的西方產品，中低收入階層的消費則更多地集中於國產品。中國經濟總量倍於印度已有多多年，根據世界銀行數據庫，2008 年中印 GDP 分別為 4.32 萬億美元和 1.21 萬億美元，中國是印度的 3.55 倍，⁵³ 但中國億萬富豪人數直到 2009 年才超過印度，2009 年億萬富豪群體資產總值仍然少於印度，中國首富資產更只有印度首富的五分之一。據《福布斯》(Forbes) 富豪榜顯示，2009 年中國億萬富豪人數從 24 位增至 79 位，印度則從 27 位增至 52 位；中國富豪榜前一百名資產淨值由上年的 894 億美元增至 1700 億美元，印度前一百名富豪淨資產總和則有 2760 億美元，增幅逾 50%；中國首富王傳福淨資產 58 億美元，印度首富、印度最大上市公司信實工業 (Reliance Industries) 老闆穆克什·安巴尼淨資產則高達 320 億美元，是王傳福的五倍還多。在 2010 年度《福布斯》富豪榜上，印度富豪整體相對於中國富豪在

⁵² 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摘要 2010》第 37 頁。

⁵³ 引自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摘要 2010》第 196 頁。

資產上的優勢進一步擴大，印度前一百名富豪資產總額達到三千億美元，相當於中國內地最富有四百人資產總額，相當於 2009 年印度 GDP（1.23 萬億美元）的 24%，而與其相當的中國內地最富有四百人資產總額相當於 2009 年中國 GDP（4.90 萬億美元）的 6%。其中，資產超過十億美元的印度超級富豪人數在 2010 年一年之內便增加了三分之一，創造了 69 人的歷史最高紀錄，其資產總和有報道稱接近 2440 億美元，相當於 2009 年印度 GDP 的 24% 強。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是同樣多的消費支出，中國消費支出對國內產業的拉動效果要高於印度。

從長遠看更重要的是，如此高度集中的財富格局大大增強了印度資本寡頭左右政治的力量，以至於亞洲開發銀行也在報告中警告印度存在寡頭政治資本主義風險，大型企業公司強大的市場和政治勢力最終將演變成為印度長期經濟發展的拖累和扭曲政策的源泉。印度國內外都已經有人用以繁榮且腐敗而聞名的美國“鍍金時代”⁵⁴ 來稱呼今日之印度；在實踐中，穆克什·安巴尼涉嫌非法低價侵佔教產建築自己的豪宅“安蒂拉”，⁵⁵ 玩弄“空手道”圈佔土地並套取鉅額貸款，接二連三的腐敗大案，也充分暴露了印度被權貴資本主義綁架的風險。

也正因為印度權貴資本主義問題已經相當突出，該國陷入資產泡沫破滅和國際收支危機的風險不可低估。由於印度有數百年英國殖民地歷史，其精英階層普遍接受英語和西方背景教育灌輸，本來就較容易盲從西方激進開放資本項目、金融服務市場的主張；而由於印度鉅富的天量財富很大一部分是對其金融資產的估值，他們捲入資產市場

⁵⁴ Gilded Age, 1865~1900 年。

⁵⁵ 據印度少數民族事務部官員阿西西·約希舉報，安巴尼豪宅所用土地孤兒院預定地，安巴尼涉嫌非法低價侵佔教產，儘管 2008 年起就有人舉報，但調查者馬上便遭受壓力，安巴尼一家照樣堂而皇之於 2010 年末入住新居。

利益如此之深，維持上述主張的動機就更加強烈了。其結果是印度成為典型的“經常項目收支 / 貿易收支逆差 + 資本項目 / 金融服務市場自由化”國家，1950~2009 年僅有兩年貿易順差，其中 2000 年以來年年貿易逆差，2005 年以來整個經常項目收支也呈逆差，且貿易逆差額從 2003 年的 71.88 億美元上昇到 2008 年的 958.08 億美元，2009 年仍高達 874.91 億美元，⁵⁶ 其資本項目和金融市場開放度卻比中國和越南都高得多，2007 年末國際投資頭寸表上組合投資負債高達 1248.12 億美元，2008 年末有所下降，但仍高達 934.28 億美元。⁵⁷ 雖然印度目前的外匯儲備足以支持貿易收支逆差，但假如發生大規模資本外逃，後果便難以承受。

六、印度能夠趕超中國嗎？

印度是中國第九大貿易夥伴，中國則是印度第二大貿易夥伴，雙邊經貿發展迅速，2009 年中印貿易額為 433.81 億美元，三一重工、華為等中國企業在印度投資的企業也經營得有聲有色。正因為如此，我們更需要準確評估印度的政治經濟穩定性及其潛力。通過丹特瓦達之戰折射出來的問題，包括中國企業在內的國際商界可以更加客觀地評判印度投資環境及其風險收益，他們需要拿實實在在的金錢投資去冒險，而不是如同某些政客和媒體那樣無需成本信口開河，相信國際資本市場最終也會以某種形式將此納入對印度的評估，最終體現在對印度融資的風險貼水上。須知 1994~1995 年墨西哥比索危機就是由 1994 年 1 月恰帕斯州農民暴動而引爆的，而印共（毛）等印度反政

⁵⁶ 引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金融統計》2010 年 9 月號，第 638~643 頁。其中，2009 年貿易逆差系根據當年外貿進本幣出口額（CIF 價格）和當年平均匯率一美元兌 48.405 盧比折算，其它年份貿易差額系用 FOB 價格計算。

⁵⁷ 引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金融統計》2010 年 9 月號，第 640 頁。

府武裝表現出來的實力已經遠非當年在恰帕斯州暴動的薩帕塔民族解放軍所能比擬。

對於某些人熱衷的此類中印比較，特別是那些褒印抑中的“評估”，我們在很大程度上無須過分認真。由於印度在殖民地時代培育出了一個講英語、思想觀念和感情與掌握國際霸權的盎格魯~薩克遜國家接近的統治精英階層，加之他們大體沿襲了英國人為他們安排的政治體制，在盎格魯~薩克遜國家主導國際經濟秩序和傳媒界的格局下，在他們進行的中印比較中，中國方面的任何缺陷都會被成倍放大，印度方面則是任何成績都會被成倍放大，無論是前幾年西方排行榜上印度上榜治理良好企業、傑出企業家數目遠遠多於中國，還是西方人對印度的金融體系穩定性、股市給予更高的評價，都體現了這一點。

國際戰略角逐的需要又進一步扭曲了中印比較。從 2003 年英聯邦運動會聯合會（Commonwealth Games Federation）不顧質疑授予新德里而非加拿大安大略省港口城市哈密爾頓 2010 年英聯邦運動會主辦權，到 2005 年初美國中央情報局下屬國家情報委員會通過發佈《全球未來地圖》報告等手段操縱“印度大放光芒”宣傳甚囂塵上，再到 2010 年 9 月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和歐盟安全研究所發佈《2025 全球治理》報告，將印度列為僅次於美、中兩國的世界第三超級大國，⁵⁸ 更體現了霸主國家為維持霸權、壓制挑戰者而有意識扶弱抑強的戰略思考。

⁵⁸ 美歐官方機構共同發佈的這份《2025 全球治理》報告將印度列為僅次於美、中兩國的世界第三超級大國，在世界國家或集團排名中，印度名列第四，僅次於美國、中國、歐盟。這份報告稱，2010 年，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地區，其國力佔世界力量的 22%，中國、歐盟各佔 16%，印度佔 8%，之後是日本、俄羅斯和巴西，各佔不到 5%。報告預測，到 2025 年，美國依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地區，但其國力佔世界力量的比例將下降至 18%，中國以 16% 的比例緊隨其後。美國、歐盟、日本和俄羅斯的力量都將減弱，而中國、印度和巴西的力量將會增強。

西方國家、特別是盎格魯~薩克遜國家某些勢力在中印比較中如此抬舉印度，從他們自身的立場出發，實屬理所當然。只有抬高印度這個因為被殖民數百年而奉行西式民主政體的“最大民主國家”，才能維持西方模式頭頂的“普世價值”光環，抵禦中國模式以其成功而對“華盛頓共識”的挑戰，維持西方對某些人那種神話般的軟實力；假如這種鼓吹能夠忽悠得中國自廢武功，走上自取滅亡之道，那更是國際競爭中不戰而勝的奇功。正因為如此，他們抬高印度、貶低中國常常到了近乎信口開河的地步。在新德里召開的2010年英聯邦運動會籌備過程充滿了腐敗、無能和決策失誤，充分暴露了印度國家組織能力的虛弱，這個西方勢力刻意送給印度以抵消北京奧運光彩的機會被印度辦成了國際笑柄；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便在2010年10月2日(即英聯邦運動會開幕前一天)出版的刊物登載封面文章力挺印度，其正文標題為〈印度震撼人心的經濟奇蹟〉(*India's Surprising Economic Miracle*)，封面標題赫然是〈印度增長將如何超越中國？〉(*How India's Growth Will Outpace China's*)！且該刊網站提前於9月30日就發佈了這篇封面文章，還將其列入“評論最多”(Most Commented)、“最推薦”(Most Recommended)文章。

許多褒印抑中“評估”都強調印度從1990年代才開始實施經濟改革，起步比中國改革晚12年；但這種言論屬於誤導，因為兩國的經濟發展是建國後60餘年的結果，而不是改革之後方才開始；印度的經濟發展是在獨立建國時優於中國的基礎上開始的，而不是直到1990年代才從低於中國的基礎上起步。而在建國以來完整時間跨度上比較中印經濟社會發展的實績，我們就更容易看出那些褒印抑中“評估”的偏頗和荒謬。

表~4：1949年中印主要工業品產量比較

產品	單位	中國	印度	
		產量	產量	為中國的倍數
紗	萬噸	32.7	62.0	1.90

布	億米	18.9	34.6	1.83
原鹽	萬噸	229.0	202.0	0.68
糖	萬噸	20.0	118.0	5.9
捲煙	萬箱	160.0	44.0	0.28
原煤	億噸	0.32	0.32	1
發電量	億度	43.0	49.0	1.14
鋼	萬噸	15.8	137.0	8.67
生鐵	萬噸	25.0	164.0	6.56
水泥	萬噸	66.0	214.0	3.24
硫酸	萬噸	4.0	10.0	2.5
純鹼	萬噸	8.8	1.8	0.20
燒鹼	萬噸	1.5	0.6	0.40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 1983》、《國外經濟統計資料（1949~1978）》（轉引自張文本：《印度國家發展及其潛力評估——與中國比較》第 147 頁）。

印度現代製造業建立時間遠遠早於中國，1851 年孟買創立的現代棉紡廠比日本早 20 年，比中國早 40 年。儘管中國從洋務運動開始努力建立現代製造業，但直到新中國成立時，製造業、基礎設施和國民受教育程度均明顯不如印度。如表~4 所示，比較 1949 年中印 12 種主要工業品產量及發電量，除原鹽、捲煙、純鹼、燒鹼四項產品中國產量高於印度之外，其餘產品印度產量均明顯高於中國。特別是鋼和生鐵，印度產量分別為中國產量的 8.67 倍和 6.56 倍之多。中國開國領袖曾多次向國人提醒這一點，面對外國人時也直言不諱地承認。1954 年 10 月 19 日，毛澤東主席與印度總理尼赫魯談話時便說：“尼赫魯總理知道，我們的國家不是一個工業國，而是一個農業國。我國的工業水平比印度還低。”⁵⁹ 到 1970 年代前期，中國主要工業品產量便全面超越印度；時至今日，以“世界工廠”而聞名的中國製造業對印度製造業已經佔有全面、大幅度優勢。比較 GDP 規模，如上文所述，中國經濟總量倍於印度已有多數年，2008 年中國 GDP 是印度的 3.55 倍之多。⁶⁰ 如果從印度獨立和我國建國至今西方對兩國的

⁵⁹ 毛澤東：〈同印度總理尼赫魯的四次談話〉，《毛澤東文集》第六卷，第 361~373 頁。

⁶⁰ 引自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摘要 2010》第 196 頁。

評價都驗證了的話，印度恐怕應當比我們發達十倍才對。

隨著近年印度經濟增長實績改善，而中國傳統增長模式開始感受到勞工權利、環境等多方面約束，某些西方機構一改昔日聲稱印度服務業增長模式優於中國製造業增長模式的口吻，開始宣揚印度製造業即將趕超中國。2010年6月24日，德勤會計事務所和美國競爭力委員會聯合發佈調查報告，聲稱印度製造業正縮小對中國的差距，預計可在五年內趕上中國，引起一些國家輿論熱議。但展望未來中印製造業發展環境，我們也可以發現，除了少數要素之外，中國均優於印度，而印度優於中國的潛在環境要素需要經歷相當深刻的轉變和社會改造才能將其變成現實的製造業生產力。

“人口紅利”（demographic dividend）被一些人視為印度製造業趕超中國的機會，但綜合考慮，我們不難發現，印度無法充分利用中國人口紅利消失的機會。不錯，中國很有可能不久就迎來農業部門剩餘勞動力耗竭的“劉易斯轉折點”（Lewis turning point），新增勞動力數量甚至2010年就有可能見頂，而印度勞動力供給似乎要充裕得多：聯合國估計，2010~2035年間，印度人口將從12億增至15億，增長26%；同期勞動力數量將增長33%，達到近十億人，使處在工作年齡段（15~59歲）的印度人佔到該國總人口65%左右，令印度成為全球最大勞動力市場和對全球勞動力數量增長貢獻最大的國家；高盛（Goldman Sachs）則估算，未來十年印度GDP增速可能因勞動力增長而提高四個百分點。問題是印度低效率的教育培訓體系無法給廣大勞動者提供足夠普及的培訓。印度每年有近1300萬年輕人加入勞動力大軍，但該國的職業培訓體系每年只能培訓310萬人，⁶¹許多印度年輕人甚至缺乏最基本技能。

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殘缺不全、政府公共服務低效腐敗更足以扼殺印度發展製造業的雄心。中國基礎設施優良，全世界有目共睹，不

⁶¹ 何麗、艾米·卡茲明：〈印度是下一個世界工廠？〉FT中文網2010年9月21日。

僅在發展中國家中遙遙領先，某些方面即使置身發達國家行列也堪稱先進。考慮到印度以私有制為主體，這一點被某些人稱之為優點，卻決定了這個國家在改善基礎設施時註定要付出比中國高得多的成本，耗費更多的時間。而且，印度在改善基礎設施方面面臨資本短缺約束，而要克服資本短缺約束，動員充裕的人力以替代稀缺的資本是一條出路。毛澤東時代就是這樣以較少的資本投入完成了大規模的工農業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建設，時隔 30 年，連續兩年的大旱更令我們深刻理解了這套基礎設施遺產何其珍貴。但印度在這方面的動員能力相當薄弱。

與此同時，高度重視以促進經濟增長為工作中心、政府管理體制中高度重視結果導向兩大特點決定了中國各級政府機構及其成員有著強烈的內在動機不斷改進對企業的服務，中國政府機構公共服務效率不斷提高。1990 年代初江蘇張家港市委書記秦振華提出“團結拼搏，負重奮進，自加壓力，敢於爭先”的張家港精神後，全力以赴招徠投資和創造良好商業環境在全國政界蔚然成風。現任江蘇省委書記梁保華擔任蘇州市委書記期間（1998 年 6 月~2000 年 12 月），曾帶領六人招商團隊用 12 天走訪了美國、加拿大九座城市的 20 家跨國公司，草簽了十多份協議，引進投資八千多萬美元，而這種作風在各地、各部門並不少見。毋庸諱言，今天某些地方過度強調“招商引資”和“親商”，已經產生了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副作用，不可避免地遭到幾乎是全社會的尖銳抨擊，糾偏勢在必行，但這至少表明中國各地、各級政府在努力營造良好的商業環境。而且，在此過程中形成的一系列改進公共服務、營造良好投資環境的法規政策本質上就是一種工具，只要運用者能夠防範和消除對內資的逆向歧視、為片面討好投資商而踐踏法律和居民人權等缺陷，這種工具就能夠更好地發揮正面作用。優良且不斷改善的基礎設施、在發展中國家中名列前茅且不斷改進的公共服務效率兩者相結合，推動中國製造業生產和貿易便利化卓有成

效，內地海關通關程序的改進就是典型。

相反，在印度這個“世界最大民主國家”，其議員進入國會的主要目的似乎就是為了讓國會無法正常運作，行政部門的腐敗低效更令居民和海外投資者嘔有煩言。這十年來，印度議會會議秩序日益惡化，無論是聯邦議會還是地方議會概莫能外。議員高分貝對罵早已司空見慣，武鬥戲碼也不新鮮。2010年7月比哈爾邦議會的武鬥鬧劇就頗為典型，議會大廳內椅子和鞋子橫飛，一名女議員走出議會大門拿起花盆亂砸的照片登上了世界各國媒體，就連維持會議秩序的議長也常常遭人大聲喝止。在2010年8月15日的獨立日演講中，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譴責議員們在議會發言言辭尖刻、不堪入耳，要求他們批評得體，勿失尊嚴，就重要課題辯論時求同存異；但任何苦口婆心的教導都抵不過政客擺姿態、搶風頭的內在衝動，正因為如此，貌似提高透明度、增進民主的電視現場直播議會會議之舉似乎沒有改善議會秩序，反而助長了印度議會的秩序混亂。在臺灣省、韓國等東亞地區，我們也能看到類似的媒體公開性加劇議會混亂機制。

由於太亂太吵，印度議會常常一再展延，一些有意義的辯論無法進行；重要又複雜的立法經常遭到阻延，或者無法詳細深入審查討論就不得不倉促通過以解燃眉之急。在2010年的預算會議上，下議院短短15分鐘內就通過了五項議案。有鑒於此，新德里智庫PRS立法研究所所長馬杜卡評價道：“執政黨、反對黨和地方政黨在擺盡政治姿勢後，就沒有剩下什麼時間來辯論真正的議題。”PRS立法研究所搜集的數據顯示，截至8月28日，國會2010年會期工作時間為170個小時，但白白浪費的時間竟達一百個小時，其中70小時是因為會議展期，近30個小時是因為抗議和退席被耗掉。不考慮議員薪金，印度國會開會每分鐘花費2.60萬盧比；而在2010年8月20日，即曼莫漢·辛格譴責議員言行失當之後僅僅五天，議員們就決議把自己的薪金從1.6萬盧比一舉提高到五萬盧比，加薪幅度超過兩倍，引

起民衆熱議。⁶²

至於印度行政部門的效率，從 2010 年新德里英聯邦運動會便可見一斑。這場運動會本來是西方勢力刻意奉送給印度的一個在國際舞臺展示形象的好機會，希望印度抵消一些中國的光彩，印度官方也大言炎炎要壓倒 2008 年北京奧運會，但在七年的籌備過程中問題百出，體育場館和運動員村項目無法按時完工，開幕前不到兩週時接連發生臺灣遊客遭遇槍擊、主運動場尼赫魯體育場外人行天橋和舉重館天花板坍塌事件，運動員村衛生狀況被檢查的外國代表評為“不宜人居”，致使多名外國運動員退賽，多個外國體育代表團宣佈推遲到達，新德里居民紛紛出城逃避運動會，《印度時報》2010 年 9 月 23 日公佈的民意調查顯示 68% 的受訪新德里居民為這屆運動會感到丟臉，還有印度媒體以“國恥”為題報道此次運動會。這場運動會非但沒有如同汶川地震僅三個月後舉辦的北京奧運會那樣充分弘揚一個崛起大國的動員能力和凝聚力，反而令印度的渙散、低效、腐敗、不安全暴露無遺。

腐敗更是印度的頑症。在透明國際 2010 年的廉潔排行榜上，印度排名第 87 位，雖然好於墨西哥（第 98 名）和俄羅斯（第 154 名），但與新加坡（第一）、美國（第 22 名）、中國（第 78 名）差距甚大。2010 年末以來，印度又接二連三爆出腐敗大案。印度電信部前部長安迪穆圖·拉賈違法低價發放 2G 手機運營牌照案被反對黨指為印度史上最大腐敗醜聞，印度聯邦審計總署報告指責拉賈以“武斷的、不公正的和不公平的”方式和“低得難以置信”的價格發放牌照，令印度財政損失 310 億美元，且在 2008 年發放的 122 個牌照中有 85 個都被不符合資格的企業獲得。此案仍在風口浪尖之上，印度最大反對黨印度人民黨領導人又在 2011 年 1 月 9 日爆出了更驚人的官員腐敗黑金數字，聲稱印度政府官員有三百萬億盧比（約合 43 萬億元人民

⁶² 《聯合早報》2010 年 8 月 30 日。

幣)黑金存放國外,據說2009年瑞士銀行因其客戶涉嫌逃稅而遭到美國等多個西方國家稅務部門調查,而瑞銀公佈的部分儲戶信息顯示最高額存款來自印度。

印度的腐敗問題已經深入骨髓,大多數印度學者和分析家認為,在政黨、國會、邦議會、政府和大公司裡招搖過市的腐敗分子比例遠遠高於關在監獄裡的罪犯佔全國人口的比例。不僅上層,基層腐敗也極為猖獗。筆者友人魏雪女士2010年英聯邦運動會結束後不久曾赴印度,在新德里駕車剛剛上路便被印度警察攔住,以“超速”為名要求罰款兩千盧比,實際上汽車在那種路況下即使想超速也無法實現。魏雪女士與對方據理力爭,同行者告訴她這純屬徒勞,因為英聯邦運動會期間警察們不敢頂風索賄,好不容易等到運動會結束,憋了兩個星期,正幹勁十足要“奪回損失”,最後魏雪女士與他們討價還價,以一千盧比的半價“優惠”了結此事。

更為致命的是,印度政體存在一系列嚴重缺乏,既容易誘發腐敗,又無法實施有效監督。為了爭取支持,穩固執政基礎,國大黨這樣的大黨常常不得不將某些內政外交重要部門交給一些並不具備相應素質的地方黨派控制,結果成為印度腐敗氾濫的一大溫床。在2010年電信執照案中,醜聞當事人安迪穆圖·拉賈來自被印度執政黨視為“座上賓”的印度平等黨,該黨雖然只是印度南部一個長期內鬥的家族政黨,但卻在辛格所在的國大黨當年戰勝印度前總理瓦傑帕伊領導的人民黨中立下汗馬功勞,國大黨對其投桃報李,結果是讓這個腐敗分子一躍成為印度電信業“掌門人”,即使在醜聞暴露之後也仍然底氣十足。對腐敗的所謂“監督”也常常淪為黨派政治張大其辭的攻訐,無助於解決問題。在上文提及的電信執照和境外黑金案中,筆者就很懷疑宣稱的腐敗金額大量摻水:憑印度的消費水平,發放2G手機運營牌照居然能少收310億美元,未免誇張;三百萬億盧比幾乎

相當於印度 2008~2009 財年 GDP (62.31 萬億盧比) 的五倍，⁶³ 印度官員海外黑金不可能如此鉅大。

七、結束語 — 一切中外對比皆須客觀全面

在可預見的未來，除非中國自己犯下大錯，否則“趕超中國”就只能是一廂情願而不可能成為現實；反倒是從丹特瓦達之戰中折射出來的印度一系列致命社會問題，我們本來已經通過波瀾壯闊的社會主義革命和改造予以消除了，並藉此奠定了國家工業化和趕超發達國家的基礎，希望不要在“改革”、“土地流轉”、“物權”之類旗號忽悠下倒退，以至於貽禍深遠，不要為某些資本的局部利益而犧牲整個國家的前途命運。

對比反政府武裝林立的印度，我們應該明白我們目前享受的國內和平多麼可貴；而我們享受的國內和平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是我們無所作為就可以永久享受、揮霍的，佔人口絕大多數的基層國民既是國內局勢穩定與否的關鍵，又是我們經濟社會發展所服務的目標。對這一點，我們必須時刻保持清醒頭腦和憂患意識。2009 年 7 月 18 日，在“《環球時報》十週年國際論壇版十週年紀念暨中國輿論與世界變遷”研討會上，我發言質疑“以私有化反危機”的主張，認為正是在 1990 年代末的私有化浪潮中，中國國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所佔份額顯著下降，且不說這樣做的經濟後果，在社會穩定方面也埋下了鉅大隱患，因為這等於是消滅了原來已經存在的一個鉅大中產階層，而且他們的子女也因為家庭經濟狀況急劇惡化、同時政府又實施了教育產業化而喪失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也就喪失了在現行社會秩序下改變命運的機會。這樣一個數以千萬人口計的群體，他們因此會對社會和政府產生什麼樣的感情，可想而知，我們經受不起再做一次 1990 年

⁶³ 印度 GDP 數據引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金融統計》2010 年 9 月號，第 642 頁。

代末那樣的事情。不到一週後，通鋼事件爆發。難道建言者希望誘導政府站到大多數國民的敵對面、把大多數國民逼上梁山？

比國企改制風險更大的是甚囂塵上的土地流轉。從整個世界來看，耕地是許多農民（包括自耕農和佃農）的主要生活來源，甚至是唯一生活來源，與大資本進入相隨的土地所有權 / 使用權轉移往往等於奪取相關農民的生活來源，發展中國家農民普遍缺乏地契進一步加劇了失地農民的補償問題，大資本從事的大規模農業開發相應有可能在當地引起激烈社會爭議，甚至演變為嚴重社會動亂。2008年，韓國大宇物流與馬達加斯加政府簽約，在該國租賃 130 萬公頃土地（相當於半個比利時國土面積）從事農業開發，結果在馬達加斯加引爆了大規模反政府暴亂，最終政權更迭。

在中國，雖然迅速發展的工業化進程吸收了大量農村壯勞力，但耕地仍然發揮著不可替代的社會保障功能。老人和婦女留守農村，為外出增加現金收入的壯勞力提供了退路；在 2008 年末、2009 年初的兩千多萬農民工返鄉風潮中，這一點對經濟和社會穩定的重要性已經得到了充分體現。我們不可高估農民進城定居的潛力，由於城市生活成本過高，絕大多數農民工難以在目前他們奉獻血汗的大城市立足定居，最終還是要到鄉村（其中一部分鄉村未來將發展成為小城鎮）落葉歸根，耕地將長期發揮不可替代的社會保障替代品和社會穩定器功能。就算可以不考慮經濟週期波動的衝擊，為了讓十家八家大資本能夠佔用農地多取得一點利潤，難道我們就該逼迫千千萬萬家普通農戶離開家園湧入城市在貧民窟中掙扎等死？

農村、農業是中國經濟和社會穩定的基礎，正是基於這一認識，自 2004 年以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已經連續七年制定指導“三農”工作的“一號文件”。而人多地少決定了小農體系將是中國農村、農業長期不可改變的現實，預計 2030 年中國人口將穩定在 15 億，屆時中國城市化率即使達到 70%，也仍將有 4.5 億人口生活在農村；即使

18 億畝耕地的紅線能夠守住，彼時農村人均耕地規模也只有四畝，中國農村作為小農社會的基本性質仍然不會改變。而小農經濟儘管有其不足，但在農村和農業大規模基礎設施已經在毛澤東時代建設完成、工業化基礎已經相當雄厚的情況下，在“集體所有，農戶經營”的雙層土地所有制度下，這一結構能夠讓農戶以兼業方式參與工業化，分享其收益；以漸進方式加入城鎮化，盡可能消除其副作用；因此有著顯著的優越性。保持這一體系的穩定，相應也就成為中國經濟和社會穩定的根基。

然而，各路資本對農地“開發”鉅額潛在收益虎視眈眈，“土地流轉”制度的實施，正讓這一根基面臨遭受侵蝕的風險，深入剖析“開發商養豬”之類新聞，⁶⁴ 就不難看出這一點。在各路資本覬覦之下，“土地流轉”和“產業開發”完全有可能成為掠奪農民衣食之本的藉口，資本、腐敗的權力和黑惡勢力結盟，更急劇放大了這一風險，而“富者田連阡陌，貧無立錐之地”從來就是動蕩之源。2006 年，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通河縣部分領導幹部和黑惡勢力聯手，暴力強奪祥順鄉魏璽村 48 戶農民 6137 畝耕地，幾個貪官每人一次便私分得七百多畝土地，這 48 戶農民則淪為地無一壟的赤貧戶，陷入致貧、致病、舉債、逃債惡性循環的泥淖無法自拔，其中部分家庭子女被逼無奈輟學充當童工，有的甚至沉淪而從事盜竊和賣淫，派生出一系列嚴重社會問題。掠奪者還動用司法機關拘留 22 名不肯交地的農民，佔該村上訪農戶的 45.8%，當地公安機關以各種理由拘留或限制人身自由的總數更達到上訪農戶的 80% 以上，當地領導蛻變為集大地主和黑惡勢力頭目於一身的社會毒瘤，就是一個令人觸目驚心的案例。⁶⁵

這些年來，打著形形色色旗號的收益私有化、成本社會化招數已

⁶⁴ 張延龍、周亞玲：〈中實養豬：房企打著養豬名義，實施圈地建房〉，《經濟觀察報》2010 年 1 月 23 日。

⁶⁵ 中國廣播網 2009 年 4 月 7 日。

經製造、激化了衆多社會矛盾，而在土地問題上如果有人企圖如法炮製，社會化的“成本”將是整個社會的天翻地覆。在通河縣掠奪耕地事件中，受害農民有的轉而信奉基督教，有的寄希望於中央派調查組像當年打土豪分田地那樣把農民的土地奪回來；⁶⁶ 即使不考慮在中國農村迅速擴張的基督教和其它宗教勢力中不乏對國家政權深懷敵意之輩，受害農民如果達到了相當大的數目，而且對國家政權主持正義喪失了信心，那會是什麼結果？2008年9月3日上午，兩百多名被逼上梁山的農民群眾衝進通河縣委書記辦公室，當面質問：“你老婆憑什麼種我們農民的地！”⁶⁷ 就讓我們看到了一種可能的結果；印共（毛）武裝崛起壯大，讓我們把這個問題看得更加清楚。那種後果可能是某些人所期望的，但絕對違反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切身利益；假如實現了這種後果，即使目前期望如此者中也会有很多幡然悔悟，恨不當初，卻無法挽回。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願主政者和掌握話語權力者思之，而投資者也不要指望犧牲整個地區、整個國家經濟社會的穩定能夠換來可持續的投資收益。

要正確評估本國和其它國家的已有成績和發展前景，我們首先需要的是擺脫盲目崇尚和追隨西方、對西方人云亦云的思想束縛，而這一弱點在中國社會堪稱流行病，在某些知識分子身上暴露得尤其突出，把隨聲附和西方刻意向中國這個最大潛在競爭對手灌輸的某些思想當做獨立思考的表現，把人家的希望當作他們已經實現的現實。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高級知識分子以西方媒體報道來依據對中國政局、中國社會、中國經濟大發議論，殊不知根據筆者本人與衆多西方主流媒體打交道的親身感受，很多西方大牌媒體駐華記者不諳漢語，對中國社會一無所知，在工作中不過是按照頭腦中經歷了多年灌輸後既定的框框和上司的要求選擇報道題目和視角，然後依賴中國助理具體聯繫

⁶⁶ 中國廣播網 2009 年 4 月 7 日。

⁶⁷ 中國廣播網 2009 年 4 月 7 日。

辦理；等到他們好不容易對中國社會有了一點瞭解，兩三年的駐華年限已到，他們必須調走，新來的記者又要週而復始從頭瞭解中國。如此反復，這些媒體對中國的瞭解永遠難以深化提高。這種體制，與中國官方媒體駐外記者都必須通過嚴格的當地語言選拔考試相比，其缺陷顯而易見。而一個大國的所謂高級知識分子，竟然要把這類近乎白丁者的說法奉為玉旨綸音，那就未免太可笑複可悲了。

與不自覺地陷入思想束縛相比，等而下之的是有意識的偏見。聲稱印度貧民窟是“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因此印度貧民窟居民享受的人權高於中國城鎮小康之家，即使不考慮其立論基礎本身便不符合事實，這類言論本質上也不過是“寧要資本主義的草，不要社會主義的苗”。在很多情況下，這種有意識的偏見甚至會驅動當事人去蓄意造假，從對中共黨史和新中國歷史的蓄意抹黑，到對國民黨和蔣介石的謊言美化，一直到借2010年4月斯摩棱斯克空難而捏造波蘭政府“節儉”、“民富國貧”的謊言，並據此對中國含沙射影，莫不如此。

要正確評估本國和其它國家的已有成績和發展前景，我們還需要提昇自己的觀察分析能力。中國和東亞經濟體一度深陷銀行不良資產泥淖，於是乎中國國內就有一些人附和西方彼時流行的說法，指責中國等東亞經濟體擁有強大集中、動員國民儲蓄能力的金融體制，讚美印度金融體系的高利潤、低不良信貸。直到中國金融機構不良資產問題已經解決、市值和資產規模穩居世界前列的今天，這類說法仍不絕於耳。殊不知金融體系存在和發展的最大意義不在於金融體系本身，而在於為實體經濟部門發展服務，為此，金融體系必須承擔一定的風險，必須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失敗，就如同科技創新一樣。一個沒有失敗的科技體系必然是沒有創新、因而也就沒有多大存在意義的科技體系，印度金融體系曾經有過的高利潤、低不良信貸靠的是高利貸和過度審慎的信貸政策，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部門發展的支持功

能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廢棄；而這樣的金融體系，又有多大存在意義呢？

民國後期金融業和金融市場也曾頗為“繁榮”，私人銀行職員工資超過新中國成立後市長、部長、局長的收入，但這種“繁榮”是建立在驚人的高利率之上的，其利率之高，直到新中國成立後的1952年6月，銀行年利率仍高達36%，以至於陳雲希望把銀行利率降低到抗戰前水平，或者略高一點，即年息10~15%，而民國金融業的這種“繁榮”給當時之中國造成了怎樣的毀滅性後果，也是衆所周知。⁶⁸“國家銀行被救活了，人民卻被毀了”——這段話描述的是1819年美國陷入經濟危機時第二合衆國銀行（實際上的中央銀行）所扮演的負面角色。當時深陷危機的美國經濟迫切需要寬鬆的貨幣政策，新上任的第二合衆國銀行總裁蘭登·切夫斯卻拘泥於銀行自身一時的資產質量，大力削減貸款，從而以加重貸款人負擔為代價而改善了銀行自己的狀況。對比一下印度實體經濟部門和金融部門的發展，這句話在很大程度上也適用於印度相當一段時間的情況。與此同時，2010年10月爆發的印度微型貸款（microlending）危機，又表明西方和我們國內某些人對印度金融體系“高利潤、低不良信貸”的褒揚至少並不完全符合事實。

借他人的酒，澆自己的塊壘；中印比較、中國與其它國家比較的話題之所以能夠在中國走紅，重要原因是很多議論者借此寄託自己對中國發展方向的期望。惟其如此，我們尤其要強調從中國獨立自主的利益出發，本著維護絕大多數國民長期利益的立場，開展客觀、全面的觀察和思考，而不可墜入外部勢力彀中，不能把自己的期望當作現實，更不可捏造。

⁶⁸ 陳雲：〈市場情況與公私關係（1952年6月11日）〉，《陳雲文選》第二卷，第167~181頁。

主要參考文獻

- 蔡昉主編：《劉易斯轉折點及其政策挑戰》，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7 年；
- 《陳雲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 《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 《毛澤東選集》第一至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 國家統計局：《新中國 60 年》，中國統計出版社 2009 年；
- 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鑑》歷年，中國統計出版社；
- 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摘要》歷年，中國統計出版社；
- 國家統計局：《國際統計年鑑 2009》，中國統計出版社 2009 年；
- 任繼愈總主編、金宜久主編：《伊斯蘭教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0 年；
- 亞洲開發銀行（ADB）：2010 年《亞太關鍵指標》（*Key Indicators For Asia And Pacific*）；
- 張文木：《印度國家發展潛力及其潛力評估 — 與中國比較》，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2005 年；
- 〈印度的春雷〉，《人民日報》社論 1967 年 7 月 5 日；
- 王立勇：〈當“鼠標”的效率遭遇“泥塊”的公平 — 耐人尋味的印度大選〉，《政黨與世界》（《黨建研究內參》）2004 年第 8 期；
- 呂昭義、餘芳瓊：〈印度東北地區的民族分離運動與反政府武裝〉，《南亞研究》2010 年第 2 期；
- 陳金英：〈經濟改革以來印度中產階級的現狀〉，《南亞研究》2010 年第 3 期；
- 吳曉芳：〈克什米爾的槍聲與抗議聲〉，《世界知識》2010 年第 19 期；
- 梅新育：〈印度經濟特區戛然而止的啟示〉，《21 世紀經濟報道》2007 年 1 月 31 日；
- （印）維·普·辛格：〈我要成為一名毛澤東主義者 — VP·辛格感人至深的懺悔〉；

簡·莫代爾、高塔姆·納夫拉克：〈印共（毛）總書記賈納帕蒂同志訪談〉，2010年1月；

印共（毛主義）政治局黨內通信：〈印共（毛主義）在2009年取得的成績和面臨的挑戰〉，2009年9月；

〈印度震撼人心的經濟奇蹟〉（India's Surprising Economic Miracle），（英）《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2010年10月2日；

附錄：印共（毛）武裝概況

納薩爾派(Naxalites)起源於1966年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⁶⁹西孟加拉邦委員會內以大吉嶺區書記查魯·馬宗達(Charu Majumdar)為首秘密成立的“印度共產黨毛澤東主義中心”組織，後發展成為1969年4月成立的獨立政黨印度共產黨(馬克思~列寧主義)，⁷⁰因查魯·馬宗達等人1967年5月在西孟加拉邦大吉嶺縣納薩爾巴里村(Naxalbari)發動農民武裝起義而得名，印共(馬列)等組織領導的印度農民革命戰爭游擊運動也因此通稱“納薩爾巴里運動”。由於種種原因，印共(馬列)後來分裂為多個小派別，經過一系列發展、合併，目前影響力最大的是由六個印共(馬列)組織於1985年5月合併成立的印度共產主義組織(馬列)，⁷¹以及印度共產黨(毛澤東主義)。其中，印度共產黨(毛澤東主義)源於1970年代早期印共(馬列)黨內先後形成的毛主義共產主義者中心和印度共產主義革命中心(毛主義)兩個組織，2003年，這兩個組織合併為印度毛主義行動中心，並加入南亞毛派政黨協調委員會。經過1980年代以來的多次接觸、商討，印度毛澤東主義共產黨人中心(MCCI)與印度共產黨(馬列)[人民戰爭]⁷²這兩個印度最強大的毛派組織於2004年9月21日實現聯合，啟用“印度共產黨(毛澤東主義)”名稱，與印度共產黨(簡稱“印共”)、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印度共產黨(馬列)並列印度四大共產黨組織。

在當前印度四大共產黨中，印共和印共(馬)各有50萬和80萬黨員，主張通過議會合法鬥爭和平掌握政權，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這兩個黨今年在議會中通常能獲得數十個議席，多時接近60席，印共(馬)還在西孟加拉邦、喀拉拉邦和特里普拉邦(Tripura)執政30餘年，得到印共的支持與合作；而印共(馬列)和印共(毛)各有約上萬名黨員，主張武裝

⁶⁹ 簡稱“印共(馬)”。

⁷⁰ 簡稱“印共(馬列)”。

⁷¹ 簡稱仍為“印共(馬列)”。

⁷² 英文縮寫“CPI(ML)[PW]”。

鬥爭，通過農村包圍城市奪取政權，掌握的游擊武裝隊伍有數萬名，印共（毛）的武裝鬥爭影響尤為顯著。

印共（毛）沒有對外公開黨的內部組織構成詳情，據報紙宣稱，印共（毛）仍按合併前兩黨的組織方式進行領導，即從上到下包括中央委員會、地區機構、邦級委員會、部門委員會以及小組委員會，基本上形成了一套組織嚴密的行動體系，為印共（毛）的隊伍壯大提供了良好的組織基礎。

印共（毛）成立後，原來分別隸屬於印度共產黨（馬列）[人民戰爭]和印度毛主義行動中心的人民游擊軍和人民解放游擊軍合併，延用“人民解放游擊軍”名稱。據官方介紹，合併後的人民解放游擊軍當時擁有6500~7000名武裝戰士，槍炮5500多支，其中包括大量AK型來復槍、自動來復槍、卡賓槍、連發左輪槍以及手榴彈、地雷等，並擁有一支技術型班隊，能夠製造12輪連發手槍和所用彈藥，並能修理各種武器，具有相當的實力。由於客觀原因，目前印共（毛）武裝力量具體數字不詳，一般認為該組織武裝人員約2.5萬人，村一級外圍成員五萬人，擁有的武器超過兩萬件，大多是步槍、衝鋒槍和火箭彈，是印度最大反政府武裝組織。

印共（毛）成立後，其武裝鬥爭總體上日趨活躍，印共（毛）控制的地盤也不斷擴大。2003年末，印度各毛派組織只影響了九個邦55個縣，2004年便增加到13邦156縣。目前，印共（毛）已活動於印度28個邦中的17個，包括安得拉邦、切蒂斯格爾邦、比哈爾邦、奧里薩邦、西孟加拉邦、卡納塔克邦（Karnataka）等，其中在切蒂斯格爾、比哈爾、恰爾肯德、安得拉、北方邦等幾個邦尤為活躍；在印度全國604個行政區中有223個區存在該組織勢力，在165個地區影響較大，其中又以在北起印度~尼泊爾、南至安得拉邦南部山區一線勢力最為強大，活動最為頻繁，號稱“紅色走廊”，領土面積達9.2萬平方公里，人口1.8億，約佔印度人口六分之一。在其控制區，該組織建立了稅收、司法、學校等行政機構乃至書刊出版發行部門，儼然是個五臟俱全的國中之國。印共（毛）正努力把這一地區建成一個革命聯合區域，以進一步擴大毛派組織影響和勢力，目標是將勢力範圍楔入印度重要地區，同時與尼泊爾共產黨（毛主義）、不丹共產黨（毛主義）等南亞其它毛派組織控制區連成一體，相互呼應。

40多年來，印度政府對印共（毛）武裝軟硬兼施，但迄今無論是“招

安”還是武裝清剿效果都不好。2004 年安得拉邦政府與人民戰爭集團一度達成停火協議並舉行和談，但最後還是沒能達成協議。2005 年 8 月，印度中央政府宣佈印共（毛）及其外圍組織為非法組織，凍結其資產，限制其活動。2006 年 3 月，印度內政部印發了題為《毛主義目前情況》的政策聲明，要求各邦不得與印共（毛）單獨談判；部長帕提爾在議會聽證會上說：“毛主義分子最初使用的是斧頭和弓箭，後來使用手槍，然後他們開始使用 AK~47 衝鋒槍，現在他們使用手榴彈和地雷，當然還有火箭彈……面對他們的進攻，我們決不能妥協，也不能與之進行談判，除非他們放下武器。”2009 年 10 月底，新上任的印度內政部長奇丹巴拉姆宣佈在全國實施全面清剿印共（毛）武裝的“綠色狩獵”計劃，計劃五年內肅清印共（毛）武裝，清剿行動隨後在恰爾肯德、奧里薩、切蒂斯格爾、西孟加拉等印共（毛）武裝活躍的各邦迅速展開，但在戰鬥中屢屢受挫，圍剿之戰的前景卻不容樂觀，以至於印度最大新聞週刊《今日印度》署名文章明確認為，“在同政府的這場較量中，納薩爾運動佔了上風”。